



Pan Junhua

潘君骅

应用光学专家。1930年10月14日出生，江苏省常州市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60年获苏联科学院普尔科沃天文台副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仪器研制中心研究员，苏州大学教授。从事光学仪器领域的科研工作40余年，提出了大望远镜二次凸面副镜的新检验方法，并实际应用于苏联6米望远镜和我国60厘米望远镜及2.16米望远镜的副镜检验；为我国研制大型靶场光学设备建立了一套光学加工和检测技术，保证了我国大型靶场光学仪器获得优良光学质量；对各种光学非球面的设计、精密加工及检验方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解决了光学加工的关键技术难题。主持完成了我国最大的“2.16米光学天文望远镜”、“折轴阶梯光栅分光仪”，研制了多种特殊非球面光学仪器和设备，取得显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三等奖各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发表了数十篇科研论文，出版专著1部。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回忆往事

简况 生在吴淞，庚午年八月廿三日，自己推算阳历是1930年10月14日。祖籍常州，小时候只去过一次。听大人说上一代留下的宅基

在豆市河一带。父亲潘蔚岑(树勋)，是中国最早的西医之一，毕业于北洋海军医学堂，是免费读的。前母范慕英，是嘉兴范古农居士之胞妹，辛亥革命积极分子，敢死队员，和沈景英(黄郛之妻)系结拜姐妹。生母朱贞慧(振威)，门出嘉兴朱聚元缸髻行，早先学体操，后学助产，结婚后操持家务。前母生潘君牧(1919)，潘君拯(1922)，潘君昭(1924，女)。胞兄潘君乾(1928)。

一、无忧的童年

* 嘉兴的小屋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后迁居嘉兴，大概一岁多，先住在南门徐家埭，已记不得什么了。北门秀城桥附近房子造好后搬入，母亲说，是借了明娘舅(朱德明)的钱2900银圆造的。和缸髻汇外婆家只不过几步路，沿河一转弯就到。房子二楼二底北面临河，楼上住人。楼下西面是一间客堂间，方砖铺地，用木质屏风和临河的楼梯间隔开，东面是书房间，有木地板，书房间之北是临河的水阁，夏天特别舒适。挨着客堂间的西墙外是灶披间，有门可通楼梯间进入客堂间，还有一门，门外有石级可下到河面，可靠船。书房间楼上是卧室，其北面隔出小部分做储藏室。卧室有东窗，外面没有高房子，可以看见河，夏天吹来东风特别凉爽。客堂间楼上是小卧室，其北面一小间即楼梯旁的，也可放一张床。房子的南面是一个小园子，记得有些树木，还有两口种了荷花的大缸。园子的东墙上爬满了蔷薇花藤。灶披间的西面是一小片草地，草地的西面和北面是院墙。客堂间的南面长窗外是一条石头铺的小路，对着西边院墙门。小园子的南面是一排临街平房。其中最东面的一间在1937年刚铺上木地板，是父亲准备给大、二哥读书用的。其余几间租给了别人，有一间是一个姓朱的医生(朱斐君?)用来停汽车的，我很羡慕，常常捉摸我们的大门太小，开不进汽车。

* 幼稚园和小学

嘉中附小有幼稚园、小学，离家很近。出门向西绕过福音医院再过望吴桥到建国路口就是。记得，上游唱课，一个站在我旁边的小家伙好像姓许，趁老师不注意，突然打了我一记耳光。我火冒三丈回击他时却被老师看见了。这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幼稚园老师之一是杨宠如的妻子，大人都认识，记不得她名字，大人叫她大姊，她的妹妹二姊，嫁给陈锦枚。母亲听大姊说，我那时听课思想就不集中，爱动。幼稚园留下的印象还有点心吃。上了小学一年级，平常中午回家吃饭，遇到刮风下雨有人送。姊姊上五年级，放学跟她回家，有一次我忘了还有一堂课，到她教室门口等她，结果上课铃又响了，我不敢回自己教室，在她们教室门口足足等了一堂课。仲春前后，蚕有一寸长，她的同学有养蚕的，说吞食春蚕，夏天皮肤凉爽，不怕热，我竟真的吞了一条。靠近火车站有苗圃公园，春回大地之际，老师带了我们去远足、踏青，甚为高兴，园里有卖长长的野鸡毛的，很想要，但只是想想而已。同学里不乏表兄弟，但最要好的是一个叫施原奎的，家住河对岸，有时为了送我到家，特地绕道福音医院，经过我家门口再过秀城桥。学校过节日，要出节目，班上老师派我和表兄徐雪雄表演两只小狗抢骨头，很不愿意，勉强为之。

* 在家里

父亲在上海圣心医院工作，隔礼拜回嘉兴一次，带来香蕉挂在客堂长窗上，取食很方便。暑假里，后河就有叫卖西瓜的船，常常买了一大堆，放在楼梯间里。大人睡午觉醒来才开吃，我小时中午不睡的，在院子里抓蚱蜢，满头大汗，等着吃西瓜。喜欢吃灰鸭蛋（咸蛋），母亲常常在春天腌了一瓮，约300来只，是用冬天腌咸鱼产生的卤水拌了稻草灰腌的。不喜欢吃斩碎肉和抱仔弯转（虾），大哥、二哥总是拿这点取笑我。过年时总要烧很多菜，要祭祖宗，有大公鸡。公鸡尾巴毛很漂亮，可以做毽子，我很会踢毽子，大人都踢不过我。一个冬天，我和姊姊比

赛，踢得满头大汗，脱得只穿单布衫，着了凉，得了咳嗽病，从此每年冬天要犯，母亲很着急，常常炖冰糖梨或胖大海给我吃。过了好几年才慢慢好起来。有一次过年，明娘舅来我家，向他拜年，哥磕了头，明娘舅给了一角大洋硬币，我不肯磕头，鞠了躬，只得了一角小洋。有一个夏天，全家租了小船去南湖玩，我怕翻船不肯去，一人留在家里，实在无聊，弄了两条长板凳，当飞机，坐在上面幻想飞入云端，嘴里还呜呜有声。有一次我和哥哥在后河码头争位置，不小心把他推到河里，父亲大怒，从此不许我下河边，一直到日本投降回嘉兴，已长大，禁令自动失效。小时到外婆家玩是常事，但有一次，大概天较晚或别的原因，母亲就是不让我去，我在草地上逃着兜圈子。还有一次上街，我特别想买折扇，母亲不肯，我竟然大哭躺下不肯走了，结果还是没有买。有一次父亲要给我和哥买玩具汽车，哥开口要能坐进去踩着动的，我只要了铁皮做的，上发条能动的。有一个夏天，父亲约了六七个上海医生同事到嘉兴游南湖，叫了一只丝网船，在船上吃中饭，把我也带去了。只记得我在一旁，吃了虾仁面，不知道他们吃了什么。父亲的同事在烟雨楼给我照了一张相，保留至今。

* 国难前夕

1937年的暑假，我读完小学二年级，现在想想局势应该已经很紧张了。父亲在常州老宅基上造的商用新屋刚落成，记得和母亲、姊姊一道先去常州看新房子、坐了人推的独轮车去上坟。回来时经过苏州，姊姊考苏州中学，火车上我口渴极了，要母亲买杯茶，母亲因为茶是烫的，且苏州快到了，没有买，后来想到姊姊准备磨墨用的一小瓶水是开水，给我喝了。常州房子父亲本打算用做子女教育基金的。他在吴淞也造了一点房子，名之曰慕英新村，纪念前妻范慕英。听母亲说，吴淞的房子也是“一·二八”之后造的。两处新屋后来都被日本鬼子放火烧掉。老百姓理财没有看看局势，吃亏太大了。

七七事变前夕,社会上抗日声浪已很高,抵制日货运动,销毁日货。记得我还烧掉过日本货铅笔。当时小,搞不懂,已经买来的东西烧掉,和抵制有什么关系。还有,要大家捐款购买美龄号飞机。当时,大概社会上有一股亡国论思潮,散布童谣:东洋人打胜仗,中国人吃败仗。我太小,不懂事,把它唱到家里来了,母亲听到,立刻呵斥了我。这是我平生接受的第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永世不忘。

二、避难深山号莫干

* 弃家出逃

父亲胆小,七·七事变后,决定在日本鬼子到嘉兴之前全家离开嘉兴,暂时避一避,目的地是莫干山,因为那里有三娘舅的房子,272号和200号,可以住。一同逃去的还有二阿伯徐纪高家,明娘舅家和真娘舅家。嘉兴家里的硬件家私除少数几件由二娘舅(堂房的)搬到朱聚元缸甍行保存外,其余的只好听天由命了。我们小孩的书本、课外读物,如《儿童世界》等,都放在书房间里的一张桌面是一块大玻璃的桌子里,也没有带走。逃难,先是到杭州,借住在教会学校蕙兰中学,学校里有教堂,小孩去做礼拜可以拿到铅笔、橡皮、练习本等等。那时自行车还很稀罕,有一个叫芮炳才的小孩,比我大,他有一辆自行车,带着我到街上兜风。我们在杭州时,日本鬼子开进了杭州市,汉奸市长何希甫找到父亲,要他出任伪卫生厅长,那时家境虽说已渐趋紧张,但父亲坚决予以拒绝,不肯做汉奸。后来经武康、三桥埠到莫干山脚下的庾村。到三桥埠后,大人好像就步行了,我和哥共坐了一顶轿子。记得走到半路轿杆断了,摔了下来,没事。到了庾村,住在一个小学里。那时,庾村已有汉奸出来成立维持会,把许多大人叫到空地上,嚷嚷叫大家安居乐业等等。父亲那时心情很不好,我当然不懂事,还照样淘气。记得,不知为了什么惹恼了父亲,他追着要打我屁股,我在校园里逃。过两天就上了莫干山,先住的一处房子在上山必经之路的旁边,近旁有一小

学。后搬到272号,还住过200号。200号旁边还有一家姓斯的叫斯少卿,木匠出身,有些钱,有小老婆,有一次小老婆挨打,嗷嗷大叫“三百块钱要打死了”。又有一次夜里强盗抢斯少卿家,被他家养的狗挡住,还咬下了强盗的一角衣服。我们最后搬到上横(莫干山上的一个地区)。好像是为了上学近些。记得在上横住的还有杨宠如一家,陈锦枚一家,汤玉衡和他的寡母陈颖,高学严小姐和喜儿、丽娟两个丫环。还有一家安徽人,姓龚,有一个男孩和我们差不多大,常用安徽腔称呼他父母亲:哦爸爸,哦妈妈。当日本鬼子快打到徐州时,陈锦枚说,如果徐州守不住他就自杀,后来徐州沦陷,陈锦枚也没有自杀。大概就在这段时间,听说吴淞、常州两处房子被鬼子都烧了。

* 山上生活

战争伊始,人们好像还不知愁滋味,有空照样去玩。我记得去过剑池。还有一个寺庙,忘了名字,好像叫莲寺,里面有几幅画,从不同角度看有不同的图景,觉得很奇怪。有一次大人在外面玩时看到墙上题诗,回家背诵:“避难深山号莫干,还乡空作梦邯郸……”,可见当初人们逃上莫干山,还以为避一避就可以回家的。莫干山本是江浙一带大亨阔佬的避暑胜地,小时就听说有张啸林、黄郛等的豪华公馆。打仗后只有逃难到山上的,没有听说有来避暑的。大部分房子空着,没人管,少数有钱有势的,像黄郛家有一个管家叫郑性白的,还是有点文化的人,和父亲认识,但不知为何欺负了父亲,老大、老二在给父亲的信上骂他“豪门恶犬”,这是后话。那时还有洋人在山上,山上有礼拜堂,有一个牧师中文名叫许安之。洋人早上见面都要道声 good morning,表兄海哥对我们说,外国人见面互相都说“狗头猫脸”,不知道为什么。他约我们一起躲在路边草丛里,等有洋人走过就喊“狗头猫脸”。住在272号时,一次大人的手电筒电池没电了,我自作主张把电筒泡在水里,因为我听说有“水电”什么的,结果当然一塌

糊涂,后来大人在奇怪,怎么电筒里有那么些水?我听了没作声。小学三年级是在山上读的,先是在第一次住的地方附近的小学,记得最怕做作文,有一次不知什么题目,憋了很久我写了逃难前学过的关于华盛顿小时很诚实的故事,写到华盛顿的父亲问他是谁砍断了樱桃树,下课铃响了,我赶紧刹车,以“华盛顿说:‘不知道’”结尾。老师告状到家里,老大、老二也知道了,以后总拿这件事笑话我。那时的救亡歌曲记得有:“中华男儿血应当洒在边疆上,不怕……我有血肉来抵挡……沙场流碧血,竟放宝石光,照在民族生路上,灿烂辉煌”之句。后来又上一个小学,办在岗头村的一统饭店里。徐纪高姨父家住邻近的西碧山庄里,明娘舅家住另一处,离一统饭店也不远,有一次听说表妹朱中瑜吃生米,感到非常奇怪。一次我在从上横家到一统饭店的路上,有人从高处挑了一担柴下一段石级,我为了躲避,不小心左膝盖碰上了左边石头垒成的墙的石头尖角,碰掉一小块肉,出了血,当时吓得够呛并哇哇大哭,好在明娘舅家就在石级上面,去包扎了一下,到现在还留下一个疤。明娘舅家住的房子外面有片草地,蛮大的,边上有一人多高的石头垒的墙用以挡住更高处的山土,冬天下了大雪,表哥带头从石墙上正面向下扑,在雪地上印下一个人形,特新鲜好玩。

三、寄居沪上

* 善钟路(现在常熟路)42号

到了1938年秋天,眼看日本鬼子短期内不会滚蛋,长期躲在山上总不是办法,嘉兴沦陷了,房子也被日本鬼子占了,大人决定全家搬到上海法租界去。父亲在吴淞时的一个朋友朱恢伯(朱复)先生在上海法租界善钟路和兴里(即42号)顶下一个门牌(第10号),三楼三底,我们向他租下三层楼,是一个统间。我们家大小七人加外婆和紫琴共九人挤在几十平米内,真亏得母亲操持的。大哥、二哥从学校借了一张双人铁床,我和哥哥睡地铺,姊姊睡小铁床,父

母亲一张大床。初到上海时,好像外婆和紫琴是住在广元路四维村明舅妈处,后来明舅妈到郑州明娘舅处,外婆和紫琴就搬到我们一起,两人挤在一张木床上。开始,父亲在静安寺的一幢大楼里租了一间写字间挂牌行医。没过太久,因为在上海新开业行医无法维持生活,父亲决定仍旧回到莫干山去,在武康县医院工作。在上海这段时间生活很苦,朱恢伯家阿九(朱炎仁)来串门,看见我们吃饭,菜只有黄豆芽,当面说:“你们真苦。”平时只能吃点小荤,过年母亲煮了一只猪头,趁天黑,把猪眼睛挖给我吃,事后才告诉我,说吃了胆大,因为我小时胆子很小。如果当时我要知道的话,再馋也不敢吃的。大哥大学毕业时,母亲烧了一大碗白水肉专给他一个人吃,馋死我了。装肉的碗是斜格子青花碗,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年(1941),大哥交通大学毕业,二哥上海中学高中毕业,姊初中毕业,我们小学毕业。大哥毕业后就到后方工作去了。暑假,母亲带我到莫干山去看父亲,从上海坐火车到临平下车,再坐船到德清上岸。然后要穿过日本鬼子封锁线走到莫干山。一处,老远就看见日本鬼子的岗哨,母亲告诉我不要去看它。这之前,母亲一人单独也去过,还带了那时的违禁品西药,她把药品放在饼干筒的最底层,然后放一层白糖,最上面放饼干。她说有一次鬼子翻到白糖就打住了,真危险。还有,过日本鬼子的岗哨要查良民证,而到了国民党区,良民证又是犯忌的东西,所以过了岗哨母亲就把良民证折小了塞到土地庙的墙缝里,回上海时再取出。在莫干山的那个暑假很开心,到处是树木竹林,几乎没有人,泉水清澈甘冽,就是有时一个人走在路上有点害怕。一次,母亲叫我到离家较远的一处去办事,一个人走过大礼拜堂和网球场,四周空无一人,心里真有点发毛。还一次,医院里护士谷师母的儿子谷仲凯和我一道在外面玩,他知道我路不熟,等走远了,他故意想法撇开我,我跟着他,他就不走,后来我虽然有点害怕但也有点生气,产生了自强

心理,就让他走了,自己慢慢摸索着回了家。有一个病人(?),父亲叫他老宝贝,很会吃,有一次送我们吃清蒸番茄塞肉,味道不错,我学会了。老宝贝还说,冬瓜挖空了塞上各样鲜货,用砂锅炖烂了也很好吃。山上有香榧树,结着青香榧果。还有夏枯草,即冬虫夏草,样子有点怕人。路边山坡上小竹林的竹根长出土外有一尺多长,我们叫马鞭子,采下来很好玩。走路要有技巧,特别是下山,走没有石级的小路,不会的人一步步向下挪,慢得很。表哥徐雪雄下山如飞奔,我跟他学,慢慢也能草上飞了。这个暑假大人叫我考了武康县中初一,但没有念,还是和母亲回上海了。回上海时,有一个内地人因不熟悉如何过封锁线,跟我们一起走,记得路经塘栖,吃中午饭,他请客,叫了一大盆清炒虾仁,是鲜活的大河虾挤的,好吃极了。

* 上小学

离家最近的小学是马路对面不远的私立正志小学,家里托朱恢伯先生说了情,减免了学费。我们入学时已开始上课,小学四年就要学英语,要赶落下的课很吃力,冬天来了我又犯咳嗽,英语是要念的,一边念一边咳嗽,母亲很心疼,炖胖大海、冰糖梨给我吃。姊姊说,那她也愿意咳嗽。可见当时家里是很穷的。一次读生字 picture 我花了很大工夫还是记不住,在学校操场上边兜圈子边念,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时我很贪玩,老师常家访告状。大哥看不起我,一次吃饭时,说我一定念不好书,说如果能念好书他就能叫碗自己动起来。后来又加了一句,说叫碗自己动起来是办得到的,只要把碗翻过来,里面扣个乌龟,而我读书是肯定不行的。母亲最大的愿望是我们把书读好,常说财产不值得羡慕,要紧的是学好本事,没有本事只好拉黄包车。她最担心的是我们长大了不能自立,要依靠老大老二。小学里我算术还是不错的,比赛还得过奖。正志小学有钱人家子弟不少,汉奸市长傅筱庵的孙子傅在纯、上海法院院长郁某某(郁达夫之兄或弟?)之子郁兴时都在我们

班上。有一天早上,上学前吃早饭时听到两声枪响,是从南面传来的,上学后就传说郁某某被暗杀,是汉奸傅筱庵干的。大家都非常同情郁兴时,恨傅在纯。后来傅筱庵在家被其厨师用菜刀砍死,大快人心。傅筱庵出丧那天上海算件大事。我小时还穿大褂,有一件灰色大褂袖子破了,母亲用蓝布换了两个,比较刺目,一次上早操时大褂挂在操场边小树上,老师当着大家面说这衣服太不好看。我心里非常反感,一点也没有抱怨母亲。倒是哥哥回家说了,以后就没有再穿。相比之下,傅在纯穿的是真鹿皮外套,一次他站在石灰缸边上,有人要往里扔石子,傅边退边喊不能扔,说石灰水点溅到鹿皮上就是一个洞。有一次傅在纯想到我家找我哥玩,走到和兴里口,看到里面小过弄上面都晾晒着衣裤,就退了出去,说是走在裤子下面要倒霉的。母亲不知不觉灌输给我的人生哲学思想使我轻而易举地抵抗住十里洋场的物质诱惑。我家穷,没有钱看电影,别的小孩在议论看过的片子,我就走开点。朱家老八(朱炎汉)认识杜美电影院管收门票的小孩,曾带我等开场后几分钟悄悄进去看免费电影。正式买票看只有一次,就是小学毕业时,看的是“月宫宝盒”。小学教语文的女老师叫朱其玉,很凶,成绩不好要用藤教鞭打手心,我作文不好挨过打,很痛。她还说,你们以后会感谢我的。但我到现在还不想感谢她。现在明白,做作文是要编的,说好听些是发挥想象力。还有一位英文老师,也是女的,姓谈,同学给她取个外号叫谈老三(上海话死的意思)。一次校长来问同学对老师的意见,我大概说了谈老师上课时讲废话多,可能对她不利,并且她知道了,后来她对我进行报复,考试时最后一个发给我考卷。小学里读了不少古文,《桃花源记》是最早的一篇,我对古文比较喜欢。记得如:《泅岗阡表》、《黄冈竹楼记》、《祭十二郎文》、《万里寻兄记》等都是在小学念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是配着音乐唱的。当时

太小,不懂其深刻的意境。岳飞的《满江红》已经有点懂得。记不准是1940年还是1941年,租界里大米紧张,每人每次只能买一升米,我们弄堂外,马路对面就是米店,很近。早上上学前,我、哥、姊、紫琴四人来回排队加塞,一天可以买到不少。我家有一天一共买了五斗米。为了不让夹塞,后来有人在排队者肩膀上用粉笔写号码。有一次轧米时和别人吵了起来,赶紧回家叫大哥、二哥出马助威,没有吃亏。

* 邻居

最近的邻居当然是朱恢伯家,他家阿七(朱炎兴)算是母亲的过房儿子,没养大,小学未毕业,得肺炎死的。朱恢伯还用英文为他写了一本书作纪念。老大(朱炎文)是个花花公子,要到后方去读书,老爸老妈辛辛苦苦为他准备行装,过不久就回了上海,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了。阿八小学读书很好,朱恢伯常用英语对父亲说:He is always first。阿六是女孩,小学和我们同班,虚荣心很强。朱恢伯在上海中学教英语,他的老大说他是穷教员:十只黄狗九只雄,十个教员九个穷。一次发了工资,回家路上被小偷划破衣服偷了去。朱恢伯是杜月笙儿子的英文家庭教师,好像后来通过杜月笙找了回来。

七号门牌里三楼住有一家白俄,有一个比我们大的小孩,我们叫他小罗宋,养狗。12号里一家姓戚的嘉兴人,户主叫戚再玉,是上海黑帮闻兰亭的徒弟,也是国民党里某派系人物,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占领上海,一次和陶一珊斗,没斗过,被陶扣了个贪污罪,枪毙了,这是后话。因为是嘉兴人,他的妹妹戚毓时又和姊是同学,儿子戚忍安和我们认识,故留下了较深印象。他们家还有一个小孩叫朱定梅,学习很好,常常走出家门很远又回去推推门,看门有没有关上。

二号门里面有一个小孩,额头正中长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黑记,我们叫他三只眼。十号门牌是一排的最后一套房,其西边是洋人住的公寓(apartment),我们在北面阳台上看得很清

楚,外婆天天早上要对着西方焚香念经,又跪又拜。正对阳台住一个波兰人,会说英语,日子长了搭起腔来,姊姊能对付几句。一次到我们弄堂里来,要买糖请客,随我们选,我要了带弯把子的硬糖,因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有巧克力比硬糖更好吃。还有一次请我们小孩去玩,还吃饭,我第一次吃到鲍鱼(罐头)。Apartment里外国小孩玩西式剑,铁的,不快,歇息时挂在墙根的树上,就在我们阳台下边,有一次舅婆婆带了连福来看外婆,连福人机灵,手巧,他拿一根竹竿绑了一个钩子,一下子就把剑钩了上来。隔壁九号三楼住了一家姓张的,好像是给老外开车的,女的给洋人做保姆,儿子叫张胜林,和我们差不多大,他有一双旱冰鞋,我们常问他借。一次他从三楼阳台向下丢给我们,掉在水泥地上把一个轮子给砸裂了,我们心里很过意不去。

* 打猫

和我们同一排的房子,就是6到9号之中,有一家养了一只猫,常常从北面阳台跑到我家来偷食,多次打它,教训无效,最后全家议定打死它。有一天清晨它来了,大、二两哥悄悄起床,把房间门关好,先用棍子把它赶到大哥的书桌底下,并用准备好的麻袋兜住出口,再用棍子一赶,它只好钻进麻袋。大哥拎着麻袋跑到阳台上几下子就把它摔死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处死这么大的哺乳动物,心里难免有点不大自在,但是想到它偷吃我家本来就不多的荤菜,就不同情它了。二哥去上学时把它从麻袋里拿出来,用报纸一包,顺便就扔到垃圾箱里。后来,养猫人家还在那儿敲猫饭碗呼叫它呢。

* 娱乐

家里穷,谈不上娱乐,唯一记得的一次是母亲带外婆去大世界玩,几个小孩同去。我在一处看久了,大人走开了还不知道,等发现已不见人影。找了一圈还是找不到,急得哭了,大世界里的警察问我家在哪儿,要送我回家,我想了想

还是等在原处。果然不出所料,大人不久便来找我了。其他娱乐只有在家里或附近的地方自玩。在家里,我把废电灯泡小心地扣出了里面的玻璃棒,不弄破口子,装了水养蝌蚪。在外就是玩:打弹子(玻璃球),在泥地上或水泥地上都可以;捉蟋蟀,那时善钟路一带还有不少空地;“造房子”,在弄堂里跳水泥格子等。一次,我在马路上玩,手里还拿着从莫干山上带来的“马鞭子”,一个法国巡捕想问我要,我心里想,我给了你,别回头拿了“马鞭子”抽我,我才不给呢。夏天天热,家里根本呆不住,晚饭后洗完澡就到弄堂里找小孩们到马路上,可以玩得很晚,回家又是一身大汗。过年,大人玩麻将,我们小孩在旁边看,久了也就着了,也着迷。

* 上初中

初一上是在京江中学读的,离家也很近,出了大弄堂左手转弯到善钟路底再左转不远就是。记不得什么学习方面的事,只记得附近住家门口有电铃,我学别的小孩,去按过一下铃,然后人就躲在远处,里头人开门没见有人,知道小孩捣乱,骂两声就进去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京江中学不知为什么关了门,我转到博文中学读初一下,离家稍远。只记得课间在楼梯间和同学打闹,我跌倒时把楼梯的木栏杆条撞坏了,要赔偿损失。回家大哥说我太老实,应该讹他,人跌坏了要赔。珍珠港事件后,日本鬼子进了租界,德国领事馆大放希特勒在欧洲侵略战争的影片,可免费进去看。父亲在莫干山和大哥二哥经常有信件来往,也要我顺便写些,不知写什么好,就写家里的猫在三楼窗口乘凉时不小心顺着铁皮一滑,跌到天井的水泥地上,居然没跌死。因为这事在我看来有点新奇。但是父亲的反应不佳,好像说我言之无物。当然,二哥帮他骂郑性白是“豪门恶犬”肯定中听。二哥是上海中学高才生,语文、历史、数学、英语成绩都好,一向很佩服他。大哥、二哥经常在黄嘉德、黄嘉音主办的“西风”杂志上发表翻译文章,挣点稿费助学。

四、重返山野

* 大搬家

1941年底,日本鬼子进上海租界。1942年夏,大哥已去了内地工作,二哥只身奔赴重庆上交通大学。家留在上海已无必要又很困难,大人决定撤离上海,到浙江省安吉县的小村。父亲工作的武康县卫生院和武康县立初中都在那儿,吃饭读书都有着落。母亲先将外婆和紫琴送到嘉兴托付给朱家亲戚。临走的那天,大包小包东西很多,姊和哥送她们上火车。吃完早午饭,满桌碗筷狼藉,他们通通上火车站,我一人在家,把桌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姊姊回来一看完全出乎意料,大加表扬。母亲安顿好外婆后回到上海,就动手搬家去内地。一路怎么走的已记不清,大概还是火车到临平再走水路,上岸后步行直奔安吉小村(后改称晓村)。

* 小村生活

小村位于两条溪水相汇处,两条溪水有山冈隔开,小村依靠南边的一条,稍小。房屋傍山而筑,沿溪右岸分布,溪边有小路。溪尽处翻过岗又是另一村。村庄入口处有一城门洞似的建筑,我叫它土地庙,是进村必经之地。庙门外就是两溪汇合处,有一小石桥跨于大溪之上,走过小石桥可通武康县的上柏村。村子附近有很多竹子,除毛竹外,还有红竹、石竹、苦竹、淡竹等等,关于竹子的知识就是在小村开始获得的。村里人都姓何,一进庙门走不多远,左手过小木桥是何家祠堂。小村人口不多,凭我印象,只有几十户人家。武康县中的教室和办公室是在祠堂后面山坡地上建造的四间田字形草棚里。住校生的宿舍好像就是在祠堂里。学校的操场是在进庙门后的右手,还不到小木桥。武康县卫生院设在老百姓家里,主人只知道叫阿富老头,有两个儿子,大的叫何双林,小的叫何金山。大房只生两个女儿:祥英、荷英,年纪和我们差不多。二媳妇叫金娥,二房生过一个儿子,我们去时已死掉,听说因为太宝贝了,吃坏肚子死的。大房住东边,二房住西边。楼下中间是客堂,客

堂前有一小天井,在东西厢房之间。房子的大门开在西边朝西,就是在我们吃饭间之南。阿富老头住在楼上中间。卫生院借用一楼东厢房的前半部。我们家住西厢房楼上的前半,西厢房楼下的前半一小间是吃饭间。卫生院有一个医生兼会计周遵基,两个护士:胡蕴玉、王永贞,一个勤务员。卫生院自己开伙,在一起吃,和东边的大房合用灶间。灶间有一后门,出去有一条小路可上后山。对着后门还有一块场地,其周围有些茅草披屋,其中一间有一口大铁锅,是他们烧水洗澡用的,但我不记得在那里洗过澡。其他就是猪舍鸡屋柴房等。双林嫂种了些南瓜丝瓜等爬在草棚顶上。比那块场地低一些还有一块菜园子,主人和我们都种了一些蔬菜,记得有茄子、番茄等。灶间外还有一股泉水,很小,但烧饭饮用等是够了。洗衣就要到大门外的主溪边。记不得卫生院有多少业务,都是些小毛病,只记得有过一个伤兵,住在病房里,病房在另一处,从医院往村口方向走过几户人家。有时勤务员忙,就叫我或哥送饭。伤兵对我们说,这间屋不“干净”,他晚上常觉得有一个小孩和他一起睡,后来问老百姓,说这里是死过一个小孩。住在小村的亲戚还有二阿伯(徐纪高)家、杨宠如家。徐家还要往里走,杨家离村口较近。

* 上学

武康县中只有初中,我的记忆里是初二两个班,初三一个班。我和哥是从上海来插班初二。国文老师叫钱渭川,是个大胡子,我们背后就叫他钱大胡子。苏东坡的词《念奴娇》(大江东去)就是他教的。代数老师叫何健春,水平很低,课讲得很糟糕,大家听得云里雾里,还和村里老百姓闹绯闻,老百姓要把他扔进粪坑里。开始,代数课我听不懂,什么时候才入门已记不清。英语是我父亲兼的。史地老师姓蔡,名字忘了,个子很矮,忌讳别人在他面前说到黄杨树什么的。教初三物理和几何的老师汪家诨,很有学问爱读书,教课也好,我升初三后也是他教的,受益匪浅。解放后他到浙江大学教数学、力

学,和紫金山天文台有联系,80年代有一次在南京开会还遇到过,这是后话。初三班上有一个叫茹志鹃的,后来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了。有一次父亲不知为什么得罪了初三学生,他们要揍我父亲,幸亏有一学生通风报信,父亲一清早带了勤务员翻后山走几十里地,到武康县政府(在瑶坞)去告状。县长立刻骑马到小村,集合学生训了话,事态就平息了。听说带头的叫王卓,还是护士王永贞的弟弟。学校有体操课,也就是童子军课,到操场上练练而已。有一次正在上操,一个老乡肩上扛了一只死的金钱豹从边上走过,大家哗然。后来知道是他拾柴时捡到的,老乡们说山里有一种鸟,能叮在野兽的肩胛处,嘴咬不到它,它能慢慢地吸野兽的血,直到野兽死掉。还说这个老乡很穷,出庙门时向菩萨作了揖,嘴里说我没钱买香,只好空手拜拜。后来这只死豹子卖了不少钱。有一阵关于日本鬼子要来扫荡的风声很紧,校长沈厚润居然集合学生在操场上练习用日语喊“欢迎日本皇军”的口号,还说是“应变”措施。我极为反感,至今不忘。1943年的春天,武康县政府以为日本鬼子进攻势头弱了,在瑶坞造了房子,还造什么忠烈祠,落成典礼时还叫童子军去助兴,我们都去了,还住了一夜。后来不久就听说被日本鬼子一把火烧了。姊姊在小村没处读高中,呆在家里可能有一年,我记得她在家教我念王勃的《滕王阁序》且背得很熟。后来她到安徽的绩溪去上(浙江)第五临时中学。

* 美好的记忆

小村生活,美好的记忆不少,但比较零碎。

小村之秋 在小村一共住了一年,刚到不久应是秋天,记得在祠堂边靠村口的树林里,长着高高的野柿子树,结满了红红的柿子,就是够不着,也不见有大人摘。林间不时有很好看的长尾锦鸟飞来飞去,叫声很特别。

过年光景 小村冬季不算很冷,厅堂间是没有门窗的,1942年的冬天,过年前下了一场大雪,竹子被压得弯弯的,记得大人们在杨宠如

家做年糕，小孩子玩雪，还到村子外面找梅花，真真体验到踏雪寻梅的乐趣，但当时可能还不知道这句成语。过年很多人家杀鸡，我就专门去捡好看的公鸡毛，要在烫水以前拔下来，做毬子。当时方孔铜钱不难找，我找到二三十个，都做成了毬子，排在一起，颜色各异，煞是好看。而真拿来踢的却没有几个。

到邻村老乡家里吃炒年糕 母亲在结婚前做过助产士工作，但结婚后早就不干了。到了小村不久，有的老百姓就知道了，一次邻村一个产妇难产，来求母亲帮忙，开始母亲没有同意，一是技术已生疏并缺乏工具，有风险；二是正在忙家务活。经不起来人再三苦求，只好勉强为之。幸而很顺利，母子平安，老乡很感激。1943年初的春节过后，风和日丽，我们全家翻过小山坡去游玩，顺便到那户老乡家看看，主人见了当然十分热情，招待我们吃炒年糕，荠菜冬笋肉丝炒的，鲜美极啦，终生难忘。

化石？ 一次，在村后的山坡小树丛里，我拣到一块奇怪的石头，有一面是有点圆而光，另一面有几处凹凸不平。我怀疑是人的头盖骨化石，一直保留着，到搬家莫干山时才不得已扔掉。

春草池塘 春天来了，约了小伙伴到村后一处荒芜的小庙宇去玩，那儿有一个小池塘，水很干净，里面有很多很多蝌蚪，很容易抓。

放鸭 哥哥从小就喜欢小动物，家里养鸡养鸭，都是他的事。我不十分感兴趣，但他要我当助手，我也没有办法，只好跟他去。一般到天快黑，鸭子自己会回来，有时也要人去呼唤回来。有一次天很黑了，缺了一只白鸭子，哥哥叫我帮他去找，结果在溪对岸的草丛里找到的，被不知哪个捣蛋鬼用绳拴在了小树根上。

上山挖兰花 初春，春兰开始吐蕾，小村庙门外的山里兰花很多。我和哥一道拿了小锄上山。找兰花先要靠鼻子，兰花很香，老远就能闻到，顺着花香找过去，很快就能找到。往往用不了几分钟就能挖到几丛，觉得够了，就回。山上

的野生兰花大多是一般品种，听父亲说有一个品种叫素心兰的，特别香，我们从来没有挖到过。

春季远足 春天，学校组织大家到“釜托寺”去玩，要走很多路，来回要一天，带干粮。一路走去，杜鹃花漫山遍野，路边竹林里好多笋，一尺来高。边走边唱：“过一山，又一岗，山上是我们的家乡，水在谷里流，花在崖上香，我们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成长……怎能让侵略的强盗把它埋葬……叫群山响起抗日的怒吼……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要自由……”，是一首抗日歌曲，很优美。釜托寺深藏在山里，周围古木参天，绿荫蔽日。寺建在一个山包上，故名。寺里有挂在墙上的国画“打翻字纸篓”，系寺内高僧所画，画有老刀牌空香烟壳等，惟妙惟肖，印象很深。

上山闻豹吼 春末夏初，杨梅熟了，有一次同学中不知道谁发起去教室旁的山里采杨梅去，从之者不少。走得快的一路领先，大概走到山半，前面的同学突然掉头下奔并大喊“有豹子，听到豹子叫”，大家也赶紧转身就跑，其实我并没有听到豹子叫。

小溪捉鱼虾 出了村庙门的溪水稍宽，顺水而上百余米有一段地略平，故水流亦缓，水不深，只没膝，清见底，鱼虾很多，鱼不好抓，虾子徒手也能抓到，只是效率太低。我自己破了竹箴，做了一只小簸箕抓，效果略佳，但也改变不了餐桌面貌。也曾用自做的钓具去钓鱼，鱼钩是用缝衣针弯的，没有倒钩。有一次一条巴掌大的鱼来咬钩，我用力一甩，鱼儿脱了钩掉到岸边，找了半天，原来掉在岸边的一个小水坑里，总算被我抓住。其实我并不爱吃鱼，抓回去是姊的美餐。

炎炎暑假 在小村读完初二，放了暑假。教室门外平时老师叫学生种的蔬菜都已成熟结果，茄子、黄瓜、番茄等等，琳琅满目，看了眼馋。但是我太老实，连黄瓜也不敢偷一根吃。记忆最深的是表兄徐雪雄带我到村外小溪去“游

泳”，其实就是光着身子洗澡，这当然是表兄的主意，一则我们还是小孩，二则旁边难得有人走过，不过我总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至今记得。水不深，多半地方及腰或膝，只有桥下的一小块地方水较深，可以没人，整条溪水清澈见底。那时没有污染，老百姓连肥皂也很少用，都用稻草灰洗衣服。大人洗头用一种叫“井扞”的树的叶子，或井扞树木的刨花泡的水，很滑，效果很好。到现在我还十分怀念那时的生活。

五、搬家莫干山

* 上山后第二天的劫难

1943年的暑假过后，大概日本鬼子气势已衰，不大出据点骚扰老百姓，武康县政府以为莫干山上太平了，决定将武康县中和武康卫生院从安吉县的小村搬回到武康县境内的莫干山。我们家也随着搬上山。除了父母，就是我和哥哥。大哥二哥以及姊都离家到大后方去了。小村有的是竹子，零碎物件都是用竹篾编的大篮子装，都是靠人力挑上山的。上山后先落脚在一幢没人住的洋房里，门窗都好，大概是有人管的。虽说日本鬼子不大出据点骚扰，但大人还是留个心眼，除了十分必要的生活用品，大部分物件都藏到厨房下面的秘密地下室里，这大概事先就计划好的。鸡鸭由哥哥管理，关在正房外的一间小屋子里。房子南向，下面就是山坡，有石级可通山上唯一的市面（荫山），离得不远。从小村走到莫干山上，大半天就够了，我记得到了山上，收拾好东西，吃晚饭天还没黑。几个搪瓷洗脸盆还叠在一起放在吃饭间外，通向大门的南面走廊里。当晚大概是对对付付过去了，好在还是夏天。第二天一早，刚吃过早饭，听到从荫山方向传来猪叫声，以为是老百姓杀猪，准备去买点肉，母亲和哥顺着石级往下走出不远，突然急急忙忙奔了回来，气喘吁吁地说，老百姓在传着大声叫喊：日本鬼子上山啦！原来猪叫声是老百姓在捉猪，要把猪坚壁起来。于是我们赶紧手忙脚乱地收拾好东西，几乎是空手，往后山方向走。母亲胆大，不肯马上就离

开屋，父亲胆小，带着我们先走。因事起仓促，没有应变预案，不知往哪里跑，只记得是往小竹林子里钻。过了一些时候，母亲来了，也不知她是怎么找到我们的。母亲说，她一直躲在屋后不远处，直到听见日本鬼子进屋，皮鞋“得咯”声，这才离开。我们藏在小竹林里肯定有一整天，天黑以后，见到我们逃过来的方向天边一团红光，大家担心是日本鬼子烧房子，但又无可奈何。后来这团红光越来越亮，看得清原来是月亮正在升起，才算放心。所以这一天应该是农历七月十五左右。判断日本鬼子是否已经下山，是大人们的事，我只记得一天没吃，肚子已经很饿。至于如何摸黑下山，找到人家，要吃的等等，已记不清了，好像是到喜儿家。第二天不知如何确信日本鬼子已经下山，我们回到屋子里。回家一看，家用杂物倒没有什么损失，因为都坚壁好了，只是医院用的玻璃瓶子等，以为日本鬼子不会感兴趣的，被砸个稀巴烂。还有，就是哥的鸡鸭被鬼子抢个精光，因为那天早上还没来得及从窝里放出去，一抓一只。劫后，照常做饭吃饭，吃饭时闻到一阵臭气，大家到处找，都找不到源头，第二顿饭时臭气更大，我突然想起那叠成一叠的脸盆，过去一个个搬开看看，不得了，原来日本鬼子在脸盆里拉了屎，再把空脸盆叠上。在这屋子住了不久，秋季开学前，我们搬到了塔山方向的一处，是外公褚家的一个寡妇儿媳一人住着。我们叫她山舅妈。这时好像父亲已离开武康县卫生院，是被一个叫周遵基的挤掉的，就在家给人看看病，生活失去了保障。

* 继续读书

1943年秋季开学读初三，武康县中这时设在原“工部局”的房子里，初三班在二楼，教室外是一个好几间教室公用的带屋顶的阳台，视野很开阔。从家到学校要走不少路。记得就是从初三开始我才有点读书的自觉性，教物理和几何的老师汪家诤，课讲得特别好，学起来一点不难。借过一本《科学家传记》看，对我影响可能

较大。最怕是“教学概论”和历史课。为了准备考试,爬到阳台栏杆外面,邻屋的屋顶上,有一处隐蔽的角落,躲在那里背书,其味无穷。有一次日本鬼子的一架双翼飞机从阳台外面飞过,飞得比阳台还要低,能清楚地看到驾驶员,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在搞低空侦察。音乐课的老师很进步,教唱不少抗日歌曲,像黄河大合唱等等。体育课的老师姓杜,很坏,要我们学“正步走”我总是走不好,挨训。语文老师陈官方,教得还可以。同学中,一个叫胡万先的,可能是三青团员,课间休息时喜欢给大家侃大山,说日本鬼子抓到三青团员,绑成一串,然后一个个挨着砍头。其中有一个比较机灵,裤子的表袋里刚好有一枚金戒指没有被搜走,拿出来贿赂翻译说:“这是祖国的黄金,请留下,如果有可能,请……”,竟然逃过了生死一劫。别的还侃了些什么,都记不清了。初三上学期结束,放假那天,下大雪,积雪很厚,去学校时还在下个不停,到校一看,都在打雪仗。寒假过后,初三下学期,准备毕业考试有些紧张,但印象不深。倒是毕业会餐没有忘记,我第一次这样吃,菜一般,量很多,还喝黄酒,不知自己酒量,喝的脸通红,最后回家路上吐了,哥一定说我醉了,其实没醉,醉了就不能走路了。还有,调皮的同学用两根筷子,十字交叉,搞“盐变糖”把戏,叫我上当,把盐弹到我喉咙里。

六、远行上高中

1944年夏天,初中毕业,武康县中没有高中,暑假里大人打听到在天目山的浙西一中可上高中。报考日期也知道了,当然要走去参考。不幸,临走前我突然感冒发烧,当然是无法去了。哥也只好不去,因为我们年纪小,父母希望俩人同行,有照应。后来又打听到在孝丰县境内有一中正中学,刚设高中班。无奈之下,决定只好去。地点是在孝丰县章村附近的一个叫“河干”的小村子。要走三天两夜山路,顾人(田荣)挑着行李,直接去了。当时也不知考虑没有考不取怎么办,或者估计有把握的,只有父母知

道。从怪石谷翻过莫干山,第一天晚上住什么地方记不清了。第二天是由田荣找的小客栈,有点担心不要是水浒里的黑店。一路上坐下休息时脚板不能离地,继续再走较不吃力,这是听人说的,即便如此还是走得很累。第三天白天到校,校长叫孙殿柏,听说学校是胡宗南办的,为了拍蒋介石马屁,取名中正中学。条件很差,基本借用民房,刚去时,在大房间里打地铺,后来换成大统铺,一排有十来个人,还是上下两层。洗脸是在一大间没有墙壁的草棚,每个学生的用具有固定位置,洗脸毛巾整齐地挂成一排,冬天很冷,毛巾冻成冰布,不记得冬天早上洗脸有没有热水。厕所离宿舍很远,是蹲坑,很脏,晚上没有路灯,下了雨,路上泥泞不堪,总算宿舍里放了个大尿桶,晚上只要不拉肚就不要紧。

老师中只记得教国文的叫俞乾三,岁数很大,学期快结束时病死了,有一个女儿,怪可怜的。国文课上教我们读《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伐檀》篇有批评剥削者的意思,给我印象很深。还有一次,他讲得太噜苏,我有点不耐烦,就自己看抽屉里的地理书,因为坐在第一排,被他发现了,叫我站起来念文言文的课文,他很古董,叫我“潘生……”,我没有读破句,他稍微批评了几句就算了,其实文句内容我并不了然。校长孙殿柏教历史,这个人好像对中国历史很熟,但对我们高一学生而言,他的教学方法不大对头,没有课本,讲得又快,普遍反映记不住,跟不上。期末考试大家约好,全体交白卷。结果重考,开卷考试,开卷也没用,没有课本没有笔记抄什么?军训课的教官叫巫树宝,要我们天天早上天没亮就起来,跑步,做早操。冬天早上实在不想起床,有的同学就赖掉不去,一次我们有二三个人都没去,被他发现了,结果罚我们双手平举一直站到吃早餐。这个人,放寒假后拿走了我们的一床被,叫我们追回了,下面再说。其他课程记不清了,只记得三角课很

容易学。晚间要上自习课,条件很差,就在吃饭的方桌子上,几个人共用一盏菜油灯,二根灯草,很暗。大部分同学的名字记不得了,只记得一个叫王云峰的,和我打过架。还有一个姓贺的,说是国民党要员贺扬灵的儿子。此人身体很棒,功课不错,所以印象较深。课余排过一出话剧“野玫瑰”,是描写国民党特工和日本鬼子斗争的事,叫我演一个持枪的小兵,排练时,我一上台因为害怕,总是背对台下,导演说,演员切忌把屁股对着观众。最后是否上台演出,记不清了,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兴趣上台演戏。

吃,是很苦的,经常是八个人一桌,一小木盆清汤萝卜不见油花。早上有时咸菜也没有,只有一盆炒盐粒。实在饿了,只好到老乡家去买点豆制品熟食吃。很怪的是每天要派二个学生去伙房里“监厨”,我也“监”过,根本不知“监”什么。倒是自己可以用搪瓷缸煨黄豆吃。还有,可以偷大咸菜缸里腌的萝卜吃。一次我和另一学生一道“监厨”,那家伙骗我,他偷了一块萝卜,到附近的溪水里假装洗洗,我跟他学,他就笑我,其实是不用洗的。吃肉算是大事,一个学期里吃了几次,我没有统计,大概3~4次最多了。有一个初三班的同学,叫吴天放的,对我很好,他家大概离得较近,经常从家里带些吃的来,他常常分给我一些豆腐干肉酱吃。记得有一次,哥买了一点肉和黄豆,用大的搪瓷缸煨烂了吃,他尽量让我多吃些。

哥生病了,好像是消化系统问题,吃东西要吐,校方不知出于照顾还是怕传染,特地找了一间空的平房,让我们二人单住。哥病得不轻,好像还发烧,我一直守在床边服侍,有些课也缺了,记得刚好有英语考试,没考好。有什么医疗措施,记不得了,那个穷乡僻壤,大概不会有医生的。记得,最后是煮了很浓的红茶加糖,哥喝了很多,后来吐出了一条蛔虫,病慢慢好了。至于为什么要喝红茶汤,是谁的主意,都记不清了,但可以肯定不是专门的药方,是碰巧。最可能是哥自己想喝那个。

河干是个很小的村子,地势倒还开阔,旁边有条一丈来宽的小溪,远处的山也不算高,我们刚到时天气还较热,可以在上游的一些地方游泳,水比小村的溪要深些。靠近学校的地方,溪很宽,但很浅。跨溪有一条木桥,通向操场,水小时也可以踩着一个个石墩过去。秋天到了,星期日,找几个同学走出去“郊游”,一直走到有山的地方,栗子树很多,我们打下栗子,用脚踩几下,就可以吃到新鲜的栗子肉。有一次走到一家有点文化的人家,老者知道我们是学生后,很客气,泡了茶,又拿出自制的淡味山核桃来招待,可口极了。一次,我和哥出去采野果,带了一把托人从上海买来的折叠小刀,两头有大、小两片刀刃,可以打开一头,也可以两头都打开,但不能两头同时扳。哥不知道,两手拇指扣住大小刀刃,同步向外掰,结果“叭嗒”一声中间的弹簧钢条断了,小刀失去了刀把,就不能用了。小刀是“野外生存”的重要工具,没有它很不方便,再买一把,在当时当地根本不可能,我们也没设想过。这件事,引发了我后来自制小刀的思想,并及时发现条件,付诸实施。

高一上学期结束,放寒假,校长请部分同学吃了一顿饭,有我们,为什么请这些人,我们不清楚。估计和父亲是医生,是高级知识分子有关。我们把行李物品收拾好,托付给有关的人,准备开学再来拿,约了几个家在同一方向的同学,上路回家。天刚下过大雪,不好走。开始人多,有十来个,后来越走越少。我们最远,最后只剩我们两个了。第一天走得最多,一直到天黑才找了一客店住下,累得无法形容。第二天一早起来赶路,上午一个初三同学,叫马如飞,很快到家了,他家离大路很近,让我们进屋坐坐,人还没进门就大声喊叫妈妈,他妈不在家,到邻村串门去了,结果他和我们立刻一道继续赶路,去找妈妈。母子情深,深有同感,事隔多年,记忆犹新。第二天傍晚,快要到小村了,只剩下我们两人,还走错了路,越走越觉得不对头,只得原路退回,到岔路口,改变方向后,翻过

一个小山岗,到达小村。天差不多黑了,找到何金山家,金娥热情招待,吃过饭就睡了。南方没有火炕,农村甚至冬天床上铺的也是竹席,我们很不习惯,被子还算厚,没觉得冷。第二天赶到莫干山上,大概已是午后,母亲说已盼望了很久。路途中还有一处可以投宿的,是卫生院里护士胡蕴玉的丈夫所在驻地,他是一个营长,路过时间不合适,我们没去。

七、日本鬼子投降了

* 学校停办了

本来准备过了寒假再去上学,1945年春节过后,传来消息,说是孝丰一带闹新四军,学校不能开学。父母决定去人把行李取回。由母亲和我去,我熟悉路,也不怕走长路。天已不冷,两人轻装上阵,还是翻过怪石谷,下莫干山,穿过安吉县,奔孝丰县的章村到达河干。一路问了母亲很多问题,茨菇、芋头等作物就是那次路上认识的。第一天晚上,事先就打算住在二阿伯(姨妈)家,那个村庄正好离我们一天路程,二阿伯哭穷,说没有饭菜招待,我听了暗暗生气,就到附近小溪去摸了很多螺蛳,当菜吃,味道好极了。第二晚投宿何处,事先没有也无法计划,只记得天色已晚,走上一村边石板小路,路的一边临溪,有一妇女及小孩从溪边洗涤完毕回家,小孩先认出我,原来是同学,是初中班的(可惜现在已忘记他的名字)。听了我们的意图,他们说,天已黑下来,不能再赶路了,劝我们在他们家住下。记忆里,我们睡的是一张有帐子的大床,吃晚饭、吃早饭等等都已忘记。这种情况下,是无法给钱的,隐隐记得送了什么东西以表谢意。隔天早上很早就上路,走过一处山坡弯路时远远看到几只狐狸似的小动物,见我们向它们走去,一溜烟钻进了山里。好像是下午我们就到了学校。还好,学校有留守人员,我们的物件基本都在,只缺了一条棉被,说是那个姓巫的教官拿走的,还告知他当时住的地方,离学校不远,我们回去时要路过的。大概歇了一个晚上,找了一个挑夫,就回走了。走不多久就接

近那个巫某住的地方,一打听,还是有一段岔路要走,好在不长。最运气的还是找回了被子,我当时心里是不存多少希望的。余下的回家路程经历已毫无印象,不知为什么。

* 失学在家,重温大山

本来,父母总是千方百计让我们读书的,但那时大概已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呆在家里。尤其是母亲,不断地要我复习学过的课程,我在楼下外婆念佛的那间屋里,在一张西式大菜桌的一端,占据了一个固定位置,靠墙放了书和本子。计划每天上午都要自学,但实际上坚持得很不好,玩心太重。小日本是8月15日投降的,我们家很快就搬回嘉兴,所以这是在莫干山上住的最后半年时间,经济开始紧张,家里进入了“生产自救”状况。记忆里的事还不少。

挖冬笋 这是过年前后的活。冬笋味很鲜美,但冬天长在地面下,看不见,山里人有一套找笋的办法。表兄海哥(朱增浩)知道一些窍门,他说要看长势好的毛竹,竹梢下垂的方向就是竹根的走向,在这方向挖到竹根,再顺着竹根挖就容易挖到笋。就这样,半天下来也挖不到几只笋。

捉野鸡 冬天下了雪,屋外菜地尽头的小坡阴面,时常有野鸡躲进去,一次我看准野鸡躲了进去,轻手轻脚走过去想捉住它,扒开很多积雪,结果野鸡踪影全无,不知到哪儿去了。

采野笋 莫干山上除了大的毛竹林之外,还有很多小的野竹林,长的笋有手指粗,初春时节笋开始长出地面,很容易采。一早,有时不吃早饭就出发,一个小时下来可以采很多。我们学山里人,做一个三角形的布袋系在腰里,袋口在前,采到一根笋就笋尖朝下往袋子里一插,“生产效率”很高。采来的小笋是做笋干的,数量很大,按常规办法剥,那是很费时的,山里人用小刀先将笋尖斜削一刀,然后从削出的椭圆的低处,顺着笋杆向下,薄薄地削去一层笋皮,一直到底,再将笋尖在食指上一绕,一根笋就剥好了,快得很。

劈竹篾做照明 那时,菜油很贵,炒菜还得省着用,点灯更是舍不得,我们就学老百姓,劈很多竹片当灯点。我在小村就学会了劈竹篾,先将毛竹锯成一人来高一段,然后破成二指宽的薄片,再将竹片捆扎成大碗粗的一捆,泡在水里二周,拿出来晒干,就可以用了。新劈的竹篾,即使晒干也是点不着的。当然,这个照明办法只能在吃饭、洗碗等场合用,看书是不方便的。

自制小刀 在孝丰读书时把小刀弄断后,就觉得很不便,可是家里当时很困难,我没有想过问母亲要钱再买一把,而是捉摸着怎样自己做一把。一次,我到莫干山的一幢空房子去玩,看到地上有一件东西,一头是一个尖头木块,另一头是一个圆木球,中间用一片弹性很好的钢片联结(现在量得钢片宽 8.5 mm,长 130 mm),看来是有钱人家用来撑尖头皮鞋的。灵机一动,我觉得那根弹簧钢片一定很硬,可以做一把小刀,回家把两头的木块去掉,硬是在水池边的水泥上开出了刀锋,再找到合适的磨石将它磨细磨快,果然是一把很好的小刀,自己很满意。后来又捡到一个破的薄铝锅,剪下二片,一片蒙在刀的一头做成刀把,另一片做成刀壳。回到嘉兴后,捡到日本鬼子的一只军皮鞋,很好的牛皮,剪了一块,用来做了一副皮刀鞘。这把刀用来裁纸、削水果、削铅笔等,用处很大,一直保留到现在。

开荒种地 家境愈来愈差,屋边的熟地大部分是山舅母的,我们只有很小一块可种,种了些黄瓜、番茄、南瓜之类副食蔬菜。我自己专门种了一棵南瓜,精心呵护、施肥,结了一只长长的南瓜,很甜。粮食紧张了,吃过米糠加南瓜叶做的团子,味道当然不佳。于是学山里人,开出山坡上一片小竹林,种玉米。先砍掉小竹林,晒干烧掉作肥料,然后用锄头把竹根挖出(这是很累人的活),再按一定间隔挖出小坑,每个小坑里下二至三粒玉米种。山里的乌鸦特可恶,它知道小坑里有玉米,会扒出来吃掉。所以,种下玉米后,天一亮就要有人值班看守,直到玉米长

得有几寸高,这过程大约要个把星期。我和哥是种玉米的主力,留下深刻印象。

拾柴火 烧饭用的燃料主要是硬柴、小竹子、茅草。硬柴是买的,小竹子和茅草靠自己去砍和割。一次,我到 200 号附近割了一大捆小竹子,吃力又高兴地往上背回家,满以为大人会表扬几句,谁知外婆见了却说,这点柴还要背上来,不肯留在 200 号(三娘舅朱见平的遗孀,她的媳妇住处)。我当时 15 岁,哪里懂得这些人情世故,劳动、收获理所当然。割茅草,有时要走出很远,有时就在附近。有一次我和母亲一同在离屋子几十米处,临时割一些茅草烧,天已黑下来了,母亲还想再割些,我听见附近有大型野兽的低沉呼噜声,不敢说穿,只是一再催母亲回家,后来大概母亲也听见了,才同意回去。

挑荠菜 冬末春初的野生荠菜味道鲜美,我特别爱吃,不惜时间去挖,可惜收获总是不佳,我很羡慕高学严老小姐,带了丽娟种了很多菜,有一畦专门种荠菜,长得又肥又大,现在知道,这并不好吃。

至今还是一个谜 父亲有一张写字台,有时上面放一些看病用的东西,一次,桌面上有一只扁扁的,放注射针头的小铝合金盒,盒子盖着,其上居然耸立着几根白色的小柱子,大的约 1 mm 粗,10 mm 高,我用手指轻轻拨一下,塌下来是一堆白色粉末,底部留下一个很浅的小圆坑。奇怪的是,过了片刻,这些粉末又自动慢慢聚拢、堆高,成原先的样子。再推一下,又重复这过程。这堆白色粉末,估计是某种口服药品,因为那时粉剂药品都是称好分量,用纸包成小包,服用时将药粉倒进喉咙口,很容易洒落在外面。阿司匹林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是那时的常用药。可惜我后来不喜欢化学,至今不知道这个现象是否已有解释。

串门 有一家找父亲看过病的,关系很好,住在莫干山上的另一个方向,离我家相当远,不知为什么邀我去玩,父母同意,我也愿意,有一天一早出发,走了小半天到达。大概在他们家

吃了中午饭,临走时他们要送我什么东西,我不要,可我向他们要几根可以晒衣服的青竹竿,他们立马砍了几根,并修得光光的。我估计自己的力气,只拿得动三根。就是这一次,听他们说,附近山里有时要出“蛟”,在下大雨时,突然间山坡某处冒出水来,拔起竹根,带出石头,一股泥水奔流而下,“蛟龙”就飞上天去。他们还带我去看了出过“蛟”的地方。我当然不相信有“蛟”,但总觉得是一个问题,现在知道这就是小规模泥石流现象。

抓知了 夏天来临,屋外门口的一棵梧桐树叶子背面生了很多花毛虫,明知被那虫蜇上一口痛不堪言,但抓知了的欲望胜过被蜇的害怕。一次,看好了有毛虫的树叶和知了之间,有一空间可以伸手去抓,谁知还是被蜇了一下。

初识新四军 1945年春,是粮食最紧缺的时候,父亲虽说已经下岗,但武康县政府算关心高级知识分子,送了三担米给父亲,派挑夫送到我家,当时当地,肯定引人注目。那时新四军在莫干山附近活动,要筹集粮食,听人误传,说我父亲拿到一百担粮食,派了二人找上门来,问及此事,母亲打开楼梯底下的门,请他们看,说就是这些。他们临走时要我父亲于第二天到山下某地去见一下他们姓何的政委。第二天,母亲陪同父亲如约前去,下午就回来了。父母说,何政委很客气,听父亲说明情况后就让他们回家,一点也没有为难的意思。就在此时,离我家不远,住的一家叫陈光龙的,是一个不三不四的户头,要问我们“借”粮食,我们没有同意,这个人留下一句话:“斗大红烛难照后”,很有威胁味道,后面再说。

鬼子又上山,盘踞到无条件投降 当时的莫干山,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地盘,但盘踞在武康县城里的日本鬼子,要来就来。大概在六月的一天,离1943年的一次还不到二年,鬼子又上山了,我家已搬了地方,住在褚家山舅妈的房子里,前面已说过。房子也有一间密室,可堆放一些不常用的物件。得到消息后,父亲和我们年

轻人立刻躲到附近的小竹林里去,这次母亲要陪外婆,不能走开了。鬼子到我家,东翻西翻,抢劫了一些东西,装在我去孝丰上高中时用的一只小铁皮箱里,又发现后院养着鸡,一只不剩地抓起来要抢走。母亲急了,伸出一个手指,示意放下一只,那个小鬼子居然就放下了一只。事后,我们都为母亲捏了一把汗。鬼子离开我家,但我们还不知这帮鬼子是否下了山。后来打听到这次是要住下,不走了。我们摸不清鬼子的意图,当晚不敢住在原处,记得是在200号里,和衣躺了一夜。200号在较低的地方,好像放心些。第二天,只好提心吊胆地返回。过了几天,一个鬼子突然闯到我家,气势汹汹地拿刺刀在那张大西餐桌上一戳,叽里呱啦用生硬的中国话责问母亲,为什么不派劳力去给鬼子拔草。其实我们没有接到通知要派人去拔草,估计就是那个陈光龙使的坏,因为他那时已出来当汉奸,为鬼子“维持”局面。要拔草之类事,鬼子肯定先找他,他不通知我们,而告诉鬼子说我们不肯去,想激怒鬼子,来治我们。母亲和鬼子对了一阵话,鬼子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最后以哥哥跟鬼子走,去拔草,了结。这个过程,我一直在屋子的一角,摆弄一把砍柴刀,心想,如果鬼子要是用刺刀戳母亲,我就用柴刀砍鬼子,心里很激愤,把旁边的一只木盆砍了一个缺口。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这一步,那我们肯定就没命了。下午哥回来了,说拔了一会儿草,见有人开溜,他也溜了回来,我们还有点害怕鬼子再来找。鬼子这次上莫干山后没有马上走,而是有长期打算的样子。他们占领了莫干山的制高点——塔山,从我们住处可以清楚地看见鬼子们在忙碌着。去塔山应该走“中华园路”,这是在我们屋子上方的一条大路,一次,几个鬼子沿“中华园路”下面的小路走到尽头,到了我家,问去塔山的路如何走,我告诉它们,要从原路退回,走“中华园路”,其实在我们屋子旁边有一条长满草的小路,向上可以通到“中华园路”,要近得多。过了几天,有消息说,鬼子抓到几个新四

军,带到塔山背后偏僻的地方,用刺刀捅死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到恐怖。其实此时日本败局已定,而我们在穷乡僻壤,茫然无知。直到8月16日或17日,传来惊天喜讯——日本吃了原子弹,宣布无条件投降。

八、回家

* 搬家回嘉兴

此时,首先考虑的是回嘉兴去,大概母亲先下山去了一次,探明情况。接着全家轻装出发,向武康方向去,下山时遇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问山上有没有新四军。天气炎热,晚上借住在父亲认识的一户人家,开始好像很热情,免费招待的样子,后来从聊天中得知我家还有十几斤菜油未吃完,就开口“借”,意味着我们不能白吃白住的。第二天,先步行,再坐船,经塘栖,到临平,再坐火车到达嘉兴。到嘉兴下了火车父亲性急慌忙,在站台上还跌了一跤。回到家一看,占住的日本商人已搬走,楼上的两个房间是空的,除了铺在地上的榻榻米,以及一个三夹板做的,日本人用来白天放被褥的,未油漆的大橱之外,空无一物。真是“家徒四壁”。楼下最好的“地板间”里住了一家伪军小军官,看上去没有丝毫惶恐之态。他们有一个3岁左右的男孩,头很大,就叫大头宝宝,一天转眼不见了,估计是走出了大门。小孩父母当然很着急,我主动帮他们出去找,一直找到建国路大街上,把这个小家伙找到,带了回来。兵荒马乱之际,朱家二娘舅为我家保存了客堂间的几扇屏门,这时送了回来,很解决问题。不久院子里住进了几家房客:楼上西边住了吴洁身夫妇和一个三四岁的小孩;楼上楼梯边小间住了寡妇杏阿伯(朱家的女儿,我们的远房姨妈)和她的两个女儿,曹真媚和曹雪君。楼下水阁间住了嘉兴名中医杭志轩的小儿子两口子。除了曹阿伯家不开伙,也不经常来往,其他几家都在灶间里烧饭,那时用的都是柴火,乌烟瘴气可想而知。这些人家都是亲戚或熟人。至于为什么让他们住进来,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了收点房租?为了增加点

人气,壮壮胆?有一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一个大概算是国民党的接收官员,来到我们家,指着楼上房间里的榻榻米说,这是敌产,把我们气得够呛,我们当然不买账,反过来教训他一顿,后来也没事。不久,进入秋天,父亲好像去了湖州找工作,母亲带了哥哥回莫干山搬家,大哥、二哥及姐姐还没有从大后方回来,家里只有我和房客们,那时我只有15岁,母亲留了点买菜钱给我,要我自己过日子。我没觉得有什么困难,自己烧饭烧菜,买米买油,感到安排得很有条理,天快冷时,还学着别人腌了一小缸咸菜,在空地里种了些蚕豆。我家在院墙外安了一只大粪缸,是倒马桶用的。那时农村用的都是有机肥,农民经常摇了船到城市里来收集大粪,是要花钱买的,我还卖过。现在想起来,农民大概装了一船柴火(稻草、豆梗、桑梗等)出来,把它卖掉,再买一船大粪回去。不长时间,房客里面,吴洁身和杭家媳妇有了勾搭,好像两家有时都只有一人在家,同时用一只灶做饭,一男一女并排坐着往炉堂里加柴禾,这是我留下的印象,但我没有感觉到什么问题。有一次,我、吴洁身、杭家媳妇,还有一个小孩,晚上一同去看电影,散场后,他们提出吃夜宵,邀我同吃,我表示不想,还说了一句“要吃,你们吃”,当时那个女的脸有点红,并有点责怪的样子,我很奇怪,留下一个“不可理解”的烙印。

* 生活重新开始

母亲从莫干山搬家回到嘉兴,天气已很凉了,八年抗战总算结束,逃难生涯也可告别了。蚕豆芽已从地里钻出来,哥哥的鸡放在院子里,几天工夫就把刚长出来的蚕豆嫩叶啄个精光,我只好暗自伤心。回到嘉兴,首先要解决生活来源问题,父亲和国民党的陈果夫有同学关系,但一直没有什么来往。无可奈何之下,就想到陈果夫,冒失地写了一封信去,想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但并不寄很大希望。过不久,居然有了回信,介绍到湖州的一个医院去当院长。父亲到湖州去了解情况回来说,是一个破烂摊子,他

没有办法去收拾,只好不去上任。找工作没有结果,嘉兴的医院也进不去。想来想去,只能暂时私人开业行医。那时,楼下地板间的伪军已经赶出去了,诊所就设在这间房间。请木匠做了几件家具,刷了白漆。还印了不少处方单。大门口挂了块开业行医的牌子。到1946年夏天,已经工作的大哥从大西南(修黔桂铁路)回到嘉兴,二哥在交大差一年尚未毕业也从重庆回来,姐姐从安徽广德浙江第五临时中学回来。一家人总算劫后团聚,照了相,这个冬天,过了个太平年。二哥写了副对联,只记得下联是:“八年抗战归来重庆太平年”。他从重庆回来,语出双关,记忆特深。有一天,大人议论说,临逃难前,家里有二三百个大洋,怕路上不安全,装在一个髻里,埋在院子里某处。听说日本人住进来之后,曾在该处建过一个小瞭望台,并且挖了地基,所以估计是被挖走了。但还是抱一线希望,挖挖看,大哥、二哥是主力,结果是白费力气。于是自我安慰一番:打了这么长时间仗,家里人都安全,就算破财消灾吧。但是家庭经济情况紧张自不待言,母亲不得不拿出结婚前工作的积蓄(小件金饰)贴补家用。后来父亲将临马路的一排平房加以修缮出租,也解决了不少问题。

* 继续求学

1945—1946年之交,我和哥哥已失学一年。这时,复员后的嘉兴省立中学只认浙西一中的学生,我们只好插班到私立秀州中学高一下就读。1946年夏,读完高一,再转学考入省嘉中高二。老师中,高二教国文的老师是余十眉;代数老师是王芳,很不错;高二化学老师何斐纯,是何植三的侄子;高二英语老师只记得姓沈,女的,个子很小,我们背后叫她 little,人很努力,但方法不当,效果不好。高三国文老师是何植三,绍兴人;物理和数学老师现在已想不起来。英语老师向克强,抗战时当过美军翻译,他说当时美国兵看不起中国人,叫中国人为 yellow,他们就反过来称其为 white,颇有骨气,

2003年嘉兴中学庆祝100周年时还看到他。高三教历史的叫余超,大概是个国民党,1948年上半年,蒋介石已节节败退,余超在讲课时为之作解释,说是故意的,是某种战术等等。我们当时年纪虽说还小,但这种骗人话根本不信,心想,你打不过共产党就算了,越解释越可笑。余超字写得不错,我请他写了一张条幅,自号天目余生,至今尚在。美术老师张天奇,无锡人,也请他画了一条幅,保存至今。家里父亲叫我们请他画幅客厅中堂,“松鹤延年”,润笔费4元。进嘉兴中学后,我开始对古文诗词、国画、刻印章等感兴趣,但只作为课余爱好而已,真正的目标是在理工科。最好的同学叫严传德,经常和他下象棋。其他记得名字的有:王根生,郁维谦,怀国模,金德城,黄贻生,钱祥麟,张励,戴婉舜,朱家华等。高二时,我得过一次专项奖学金,是一个国民党的专员吴寿彭设的,这个人很重视人才培养,他规定高三物理、高二代数第一名的可以得奖。奖金数额忘了,带回家,交给母亲,母亲给了我一个半钱重的金戒子留作纪念。还得过一次清寒优秀奖学金。

高二时,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至今难忘,我是班里较小的,坐在第一排,班上共有四五十人。有一个家伙叫戚文焕的,个子比我高不少,坐在倒数第二排,一次课外活动时大家围圈推排球,他在近距离将排球直接照我打,明显是故意挑衅,我自知打不过他,只能告老师了之。不过这人不知为何惹恼了班上一个个子最大的同学,叫吴嗣宗的,一次课间休息时,在教室里,姓吴的明显地找个岔子,狠狠揍了他一顿,没有人劝架,我看了当然解气。姓戚的在1949年开国大典天安门游行时,还碰巧相见,打了招呼。还有一个家伙叫俞登文的,是浙西一中的,可能是三青团或国民党,在班里当个什么长的,一次改选,他站在黑板前独断专行操纵选举,我当时不知轻重地说他搞专制独裁,可能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他勃然大怒,要我写出书面检查,收回原话,否则要对我客气等等。这是我第一

次遭遇政治迫害,才16岁。还有一个叫曾毅的,本地人,流氓兮兮,一次拿了一套哗叽衣服到我家里,说要卖给我,我哪里有钱,明明是想敲大人竹杠,被我拒绝了,走时很不高兴。嘉兴中学肯定有地下党,也有国民党势力,因为我曾知道有过油印进步刊物寄到班上,但很快就不见了。1948年夏天我在嘉兴中学毕业,算下来,我初中三个学校,高中三个学校,中学共读了6个学校。1948年夏天,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回想起来,主要是自己以为把握很大,没有好好复习。暑假里,明娘舅、明舅妈经常来我家搓麻将,我控制不住自己,去看他们打牌。最后,够同济大学预科班成绩,去读了一学期,时在解放前夕,学校上课不太正常,学不到什么知识,不到放寒假,我就回了嘉兴。就是那个冬天,国民党军队有的已经开始向南撤,路过嘉兴,住过我家,记得有过二次。总是一个军官带几个小兵,他们监督母亲把所有能盖的都拿出来,我们以为这些兵会匀着盖,哪知基本上都是那个当官的用了,还睡在地板间里。当兵的不仅没有盖的,还睡在不好的地方。记得有一次,一个文明些的营长,要我带他到大街上浴室去洗澡。还有一次,一个满脸凶气的小军官,要用我们的灶头烧东西吃,父亲正在做菜,发生了矛盾,吵了起来,那家伙把父亲手里的碗夺过去,往地上狠狠一摔吼着叫勤务兵拿枪来,要打死我父亲。幸亏邻居出来打圆场,那个家伙也趁机下了台。蒋介石的兵如此对待老百姓,我算是亲自领教了。

年底,哥哥嘉兴中学春季班毕业。寒假后托明娘舅的朋友,阎仲彝,介绍我们到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插班旁听复读。南洋模范中学是全国有名的中学,因为是中学,上课受局势影响较小。南模教师水平高,学风好,我们只读了高三下,半年时间,得益匪浅。教物理的老师俞养和,用英语讲课,速度较慢,可以记笔记,半年下来我的英语听力大大提高。王季梅是很有名的代数老师,不过有一次考试中有一道解无穷连

分式的题,我没用他教的解法,而是用过去学的,我认为更简洁的方法做出,结果当然一样。他判这题为错,我到他办公室去理论,他没仔细听我说话,就说结果对了也不行,使我觉得有点不讲道理。但我知道,我在听讲时就没有去记住他讲的方法。开始,我们住在阎仲彝家客厅后面的阁楼里,不久搬到学校里寄宿。南模的地下党力量很强,当时并不知道,我的邻座徐弘毅就是地下党,临解放之前,他曾叫我去将学校附近某地的一些高级住房的地理位置、道路情况画下来,说是为迎接解放军进城做准备。他介绍我参加了“新青联”,还给我看《新民主主义论》等书。高三共有甲、乙、丙三个班,我是丙班。因为只读了半年,记得的丙班同学较少,只有盛志定、吴惕生、阎育嵩、顾燕谋、徐弘毅等几个。相反,因为住校,和甲、乙班的住校生熟悉的倒不少。(2004年10月24日南模49届毕业的同学,五十五年聚会,见到不少甲、乙班的,相互认出的有好几个。见到唐孝威,他是当时地下党的领导之一,学业很好,后来在清华物理系毕业,分配到九院搞原子弹,遗憾的是在“文革”中受到极大冲击,九死一生。虽然后来很早选上了中科院院士,个人得到一些补偿,但作为难得的科学人才,他失去了最宝贵的年华,这个损失是整个国家和全人民的。有中国国籍的华人,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一人在科技领域取得诺贝尔奖,这个问题不值得深思吗?)

九、蒋家王朝覆灭了

1949年的春天,蒋介石的灭亡已指日可待,江北退下来的败兵也驻进了南模,那几天好像停课了。有一件事深深刺激了我:一天,校园里一棵小树上绑了一个士兵,满头满脸是血,旁边一个老妇人,一脸失望与无奈。听别人说,那个兵是从苏北战场开小差,自己跑到上海,不巧,刚好碰到他所在部队也溃败到上海,在马路上被认出了,就抓了起来,肯定先是猛一顿打。他老母亲得知后向其军官苦苦哀求,无济于事。第二天,人不见了,听说被拖到交大里面一个偏

僻的地方给活埋了。这是我第一次直面人世的无情与残酷,永世难忘。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睡在床上,听到枪弹声不断,不时有子弹从房子上飞啸而过。第二天解放军就进了上海,学校里的地下党(估计)马上组织同学写标语,“欢迎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等等,我还自作主张,写了一条“解放香港”,不知是否贴了出去。实际上,解放军过了长江,占领南京后就标志着蒋家王朝的覆亡。对于解放,按我家的情况,我们是毋庸置疑地举双手拥护的,解放军进城后的表现,有口皆碑。上海解放后,我们没有立刻回嘉兴,而是留校一段时间复习功课,一方面也是因为上海到嘉兴的铁路桥梁被国民党军撤退时全炸毁了。后来回嘉兴时,铁路桥梁还没有修好,人要下车乘船摆渡,上了岸再坐另一列火车。这一年高考并没有因战事而取消,我报了北洋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都报机械系,上海的大学是统一招生,我报的是工业管理,因为一心想进交大,而只有交大有工业管理系。记得,去上海参加考试是7月1日,事前人民政府发出通知说,一定在七一之前修好沪杭铁路上的桥梁,果真就在七一那天通车了,尽管桥是用枕木架设的临时桥,在我心目中还是共产党说到做到,真了不起。结果,交大、清华、浙大都录取了,浙大取的是物理系。当初决定去上海交大,打算进了交大再转机械系,已放弃了大批清华新生集体从上海去北京的机会,后来哥哥接到北大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和哥一同去北京上大学,家里也赞成。赶上清华第二批学生集体去北京。

十、清华园的三年大学生涯

集体从上海出发,自己就算进了清华。那时过长江要轮船摆渡,得花费2小时左右,人都要下火车,上岸后等火车车厢都连接好,人再上车。那天是晚上,有月亮,听见一个暑假后返校老生(后来知道就叫沈良照)在用上海话向别人讲天文知识,指着月亮比画,说它一个月绕地球一圈等等。那时火车很慢,过了两个晚上才到

北京。报到后,分派住到明斋213号,四人一间,有孙一康、唐树成、汤坤荣。为照顾南方来的新同学,当天晚上吃的是白米饭,第二天就吃高粱米了,因不习惯,肚子未饱但就是吃不下去了。上课没多久,就逢开国大典,天不亮就在操场集合,互相检查,身上不许带小刀。步行进城,分配坐在天安门广场前,整整一天,那时年轻,也不知道累。回来时天已黑,坐敞篷货车回到清华园火车站。刚解放,学校政治活动还不多,有个天文学习会,是叶式辉、杨海寿、孙良芳等物理系的高班生在操办的。我对它发生很大兴趣,原因是在嘉兴夏天乘凉时,躺在木板上仰望天空,只见满天星斗,却一无所知。参加天文学习会,可以学到好多知识。第一次活动,是听戴文赛先生讲:“关于太阳,我们知道得还很少”。有一次,天文学习会的成员,气象系的刘宝琳,算出某月某日凌晨,有月掩金星天象。头天借好了气象系的一架蔡司120mm口径赤道仪,大家起个大早,到操场一看,月亮离金星还差老远。原来,计算的时刻是对的,只是报错了一天,是个低级失误,第二天再看,时间很准。为了便于大家熟悉星座,叶式辉让我刻蜡纸,画星图,利用画过的工程画练习图纸背面,油印后分发大家。懂得了伽利略望远镜原理之后,一年级暑期回嘉兴,找到父亲的一片老花镜片,和二哥的一片深度近视镜片,再用两个废弃了的手电筒,做成一个低倍数的伽利略望远镜,用来看看月亮还是比肉眼强不少。那时非常想有一架口径50mm左右的望远镜,但是只能想想而已。孙良芳有一个2英寸的双胶合物镜,他自己用纸做镜筒做成一个望远镜,十分羡慕。我曾写信给上海那时少有的一家光学公司,问磨一块50mm口径的平凸透镜,要价是50元,当时每月的伙食费是8元。我试图自己磨镜头,不得其门,随便找了窗玻璃碎片,在水泥台上磨成圆形,再找到一把小锉刀,锉出球面,想磨片目镜,也不知道怎么抛光,瞎摸索。结果当然劳而无功。课外天文学习和磨镜片,花掉不少宝

贵时间,甚至影响正课。大一物理两次小考很不好,大考时急了,只好摒弃一切杂念,狠狠复习,考了九十多分,才将总分扳了过来。到大二时曾想转物理系,估计很难,没提出申请,自己做了个决定,以后向精密机械和光学仪器方向努力。在机械系图书馆里找过用无心磨床工作的文章看,还认真地翻成中文。想旁听物理系叶企荪先生开的光学课,但和机械系的木模课时间冲突,自己悄悄放弃了木模课。大一时还去听从小就敬仰的华罗庚先生开的数论,并坚持一个学期,认真做了笔记,开始还做习题,但发现我解一道普通题目花的时间太多,不是学数学的料。政治学习主要是听费孝通先生的大课:新民主主义论。经常有不定期的政治报告,印象最深的是伍修全出席联大某次特别会议回来的报告。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围绕中国是否该出兵的问题,让大家讨论,答案当然是应该出兵,我的观点不用讨论就是该出兵。后来,就是走出学校到工厂去宣传,机械系到长辛店。我由于1949年暑假在嘉兴划船过度,扭伤了腰,那时正在发作,先是没有去,后来好了一些。正好张永备家里来了电报,我借机送电报,一个人去了长辛店,就留下和大家一起活动。对共产党的好印象,除了刚解放时党的干部的表现,还因为不少党员是地下党,又是业务尖子,像吕应中、唐孝威等。那时学生开始搞生产劳动,就是种菜,我被选为生产委员。北方每畦菜地的四周都是高于种菜的部分,和南方正好相反,开始觉得奇怪,后来马上就想通了,因为北方雨少,经常要人工灌溉,而南方雨多,需要自动排水。为了收集肥料,还下到明斋下面的化粪池里去掏粪,当然有点咬咬牙,但我是生产委员,又是在强调劳动光荣的总形势下,不得不下去。

大一的普通物理课是余瑞璜大教授上的,但是他的讲课水平还没有助教何成均好,很多同学都去听何的课。钱伟长是很有名的教授,他讲到共振时说,美国有一座桥设计时忽略了当地的一种风,很有规律,在某个季节到来,一

阵阵,有固定的频率,正好和桥的自振频率相同,桥建成后遇到这风,结果被吹得拧麻花。我毕业后,在真如境为仪器馆整理图书时,发现一本英文书里有这桥被风吹扭的照片。还有,他讲到圆柱体受扭力被剪断,按计算,断面呈45度,随手拿一支粉笔拧一下,证明的确如此。但是,他有点太骄傲,教我们材料力学,他说,“给你们上课,我只要早上坐在马桶上时,备十分钟课就行了”。有一次整个一堂课,主要是推一些公式,写了一黑板,结果都推错了,下一堂课推倒重来。还有一次,是在讲刚体力学课时,计算一个例题,要用到北京的地理纬度,他考我们,问谁知道?大家没有作声,他就教训我们,说,大学生了,连这都不知道。这时,我站起来说,“40度差一点,可以按40度算”,不料钱伟长先生说,40度“多”一点,我坚持40度“差”一点。最后,他叫课代表吴宗泽到系办公室去看墙上的地图,吴宗泽看了回来,用手比划说,离40度线不到一点点。我想,钱先生一定很不好意思,其实这是他逼的,不能怪我。我那时正热衷于天文,知道北京纬度是39度五十分。体育活动我不精,基本上是随便玩玩,但当时的劳卫制四项基本要求我都刚好达标,游泳才学会,班上一次通过的人很少。抗美援朝开始,号召大家报名,参军参干,绝大多数人都报了名,我也很想报名,但那时腰扭伤时而发作,大家都知道,体检肯定通不过,所以就没有报。虽然最后批准的人很少,但总是一件憾事。

二年级将结束时,知道我们这一届的理工科将提前一年毕业,就是和前一班的同时毕业。当时的心里主要是高兴,父亲倒是觉得少学一年有些吃亏。毕业前,中国科学院提前到学校来招兵买马,我在之前从报上知道由王大珩、丁西林、钱临照等几位科学家发起筹建仪器馆,而我正好在迷天文望远镜,很配胃口,就填了表。当时总的形势是批判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强调个人服从国家,号召大家服从组织分配,我心里没有一点把握,但最后宣布我被分配到了仪器

馆,如愿以偿,有点喜出望外。不过原先知道仪器馆是建在北京的,发榜时地点是东北长春,有点遗憾。当时的校党委书记何东昌在毕业分配学习总结大会上说,只要不是从个人名利出发,个人志愿是会照顾的,并且不点名举了我的例子,说是照顾个人兴趣,我一听就知道,但是他把望远镜说成了显微镜。

十一、出关

宣布分配名单,在我们班,我好像是第一个,比较早就与其他系分配到科学院的同学一起到城里文津街科学院院部报到。物理系的人比较多,如唐孝威、叶式辉等。还有北京别的学校分配来的,如北大的邓锡铭,辅仁大学的张佩环等,一共有二十多人。唐孝威是临时学习班的党支部书记,邓锡铭是副书记。一共学了两个月左右,主要是听报告,学文件,讨论等,也有文娱活动,看电影等,记得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音乐厅,听过朱德的报告。集中学习结束后,到各自的单位报到,仪器馆当时还是筹备处,在真如境,离文津街不远。很快见到王大珩馆长,他讲了些什么已记不得,只记得带我们去一个私营小厂参观体温计的制造过程,还到物理研究所参观光学车间。这时我才明白正经磨光学镜头的过程。这个光学车间划归仪器馆,搬到长春。大部分人,包括1951年分配到仪器馆筹备处的几个大学生,像唐九华、刘颂豪、郑璋等先行去了长春,我被王大珩留下来整理和登记几箱要运到长春去的图书。1952年10月25日和物理研究所光学车间的人一起坐上(不是卧铺)开往东北的火车。车过沈阳是晚上,天已很黑,龚祖同先生当时在沈阳,亲自到车站和我们见面,表示欢迎,深受感动。当时还不知道龚先生,误以为是王大珩,下了车见面才明白。10月26日到达长春,有总务科的人来接站,用马车把我们拉到铁北,先安顿好住房,是日本鬼子造的二层小楼,在二楼第三间,四人一间,干福熹,周盘麟、吴世法先在,留下的床位当然是靠门最差的位置,干福熹占据了里面靠窗最好的位置。一

排六间,公用厕所,第一间住了沈人骥、唐九华、丁衡高和汪廷相,第二间有崔志光、刘顺福,第五间是大连大学来的四个(王之江、王乃弘、沃新能和姚骏恩),最后一间有余杰,王世焯。

办公楼离宿舍很近,是东北材料试验机厂一层楼的旧房子。王大珩放弃北京到长春,主要是想很快发展,合并了东北材料试验机厂、东北综合研究所的光学部分等。我到长春时,先到的人已开始工作,分机械、物理和化学三个研究室,学机械的主要是在设计炼玻璃的熔炉,看他们经常挟着书和计算尺出出进进,不胜羡慕,而我却被分去技校教书。那时“服从”是第一位的,无二话可说。技校是为试制车间培养青工的,而试制车间属机械研究室管。要我教金工及代数两门课,我认真备课,认真讲课,那些从上海招来的高中生,很快就和我关系处得不错,也很尊重我。有四五个人,好像是王树森、陈靠恩,王菊林等,春节不回上海,自己在锅炉房因陋就简烧年夜饭,约我去同乐。有几个东北本地的男孩,关系也不错,像张竹林、张作舟、刘吉利等。

初到长春时,生活条件无从谈起,从宿舍到食堂要穿过一片空地,大碗盛高粱米饭,菜是白菜土豆加几片肉炖的大锅汤。看到王大珩馆长也这么吃,吃得很香,我们就一点怨言也没了。不过,到了星期日,经常要约两个人到市内“国营食堂”去加油,经常是和王乃弘和周盘麟,有时唐九华,汪廷相。“国营食堂”的名菜是番茄猪排,8角钱一大盘。有一次圣诞节,周盘麟提议到长江路乌苏里餐厅去“洋”一下,三个人吃掉10元,当时算是很奢侈的,至今记忆犹新,好在周盘麟主张AA制,算得一清二楚。还有一次,螃蟹上市,很便宜,我们买了一些,到经常去吃饭的小餐馆,要老板煮一下,再点几个菜,吃的较长,老板看生意很忙,我们占位置久了,有点不乐意,略有微词,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结果这个不识相的老板被周盘麟训斥了一番,那时还没有实行私有制改造,但我是不会

这样的,看周盘麟这样“老练”,有点意外,也长了见识。

机械室主任是张静安,上海交大毕业,留学英国,广东人。副主任成忠祥,原材料试验机厂的,东北人,他手下有刘绍宽、邵海溟、田世文、王宏义等人马。我们新来的大学生则由张静安安排工作。我在技校专职教书时间不长,被调回室里,边搞仪器的改造和仿制工作,边教书,前后有:炮队镜改经纬仪、沼气检定仪、气体流量计、修复青岛观象台的150毫米赤道仪镜筒、意大利经纬仪等。那时我们从设计到工艺、施工什么都要管,但没有经验,很辛苦。经纬仪原则上应该是内调焦的光学系统,但指导我工作的先生要我把炮队镜的目镜改为调分划板,以代替内调焦,这就引起很多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光学原理上的不合理。当时我不懂,只能照办,结果在调分划板前后位置的机械结构上无论怎么样也做不好,弄得我日夜寝食不安。个别原日伪留下的技术人员还要在旁边看好笑,挑拨是非。我在搞沼气检定仪时,有一个约 $1 \times 2 \times 10 \text{ cm}^3$ 大小的三通道气体密封室,由三个气室构成,我采用苏联进口的厚铜板钎制的方案,试验过,不漏气,有一个叫杨乐天的车间工艺师,看见在加工,悄悄向王大珩汇报,说我浪费。王大珩听了,也没作调查研究,把我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我十分委屈,大哭一场。后来王大珩要王守中改工艺,王守中用薄铜皮弯出三个气室,再焊,结果总是漏气,最后还是改回我的方案。不过王大珩对我在标定气体流量计时用的土办法,很为欣赏,从他向参观者介绍时看得出来。张静安先生在指导我工作时,闹过两次低级笑话,一次是在讨论沼气检定仪壳体浇铸方案时,他把浇铸口的位置设得比壳体的最高部还低,当然,一经提醒他立刻知道不对。还有一次是研究气体流量计的铝板外壳的阳极氧化处理,讨论药剂成分,配方上写着有一样硫代硫酸钠,他不知为什么说这是用硫代替硫酸钠。其实,硫代硫酸钠俗称大苏打,中学化学课就学过。这两次笑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直

忘不了。不过张先生人很直爽,不像成忠祥,城府很深。

工作之余,我在宿舍里还自己磨玻璃,虽然仪器馆有光学车间,我从来没有想到占用公家器材,而是到街上去买。连镀银用的硝酸银也买了。加上喜欢买书,吃,所以总存不起钱来。1955年元旦刚过,4日,上班第一天,接到父亲电报,说母亲病危,快回家。向杨秀春借了60元钱,立即动身。经天津、济南、上海转车,8日凌晨才到嘉兴。一路上总担心能否见到最后一面。还好,到家总算见到了,母亲神智很清楚,但她自己和父亲都已不抱希望。1954年春天我为了调研150毫米赤道仪,到佘山天文台,顺路到嘉兴,回家住了短短两天,母亲做了我最喜爱吃的虾仁面。其实她很想我再多住几天,可是没说出来。临走母亲一直送我,看我进了月台,依依不舍的情景,永远不能忘记。后来就知道她得了病,还到杭州去看病,那时年纪轻,不懂,没想到会有大病。回到嘉兴才知道是肝病,杭州医院说是“间质性肝炎”,其实就是肝癌。肝部摸起来很硬,但我摸不出。根据哥哥在孝丰读高中时生病的经验,我以为吐出蛔虫就会好的,要父亲买红茶,烧给母亲喝,他明知无用,还是办了。母亲理解我的心情,说:“骅官还想我好起来”。当天因路上太累,在楼上房间睡,到11点才醒来,没有在楼下她的床前陪,母亲说晚上想喝水没人倒,有点不高兴。第二天当然一直陪着,她把身边的九十几元钱给了我,还坐起来要人梳一下头,这些,回想起来她是已经自知不行了,9日晚上10点30分去世。她一直在等北京农大的哥哥回来,没等到,实在不行了,就咽了气,但眼睛的确没有闭上,真是死不瞑目。哥哥过了好几天才回家,连棺材盖都已钉死。原来哥正在申请入党,表现积极。入殓前,我守了两天灵,看着看着母亲的遗容我就大声嚎哭,好像只有大哭才能摆脱一些痛苦。朱家亲戚来吊唁的不少,雷舅妈哭得最厉害,开始我深被感动,但过一会儿哭声突然刹车,戛然而

止,我恍然大悟,这是礼仪。家里有人去世,自有一些靠迷信吃饭的来找活计,一帮和尚要给亡灵超度,父亲正在伤心时刻,也就同意了,也是母亲的遗愿,和尚们还要我这样那样配合,开始我有点稀里糊涂,任其摆布,后来我火了,把他们轰了出去。后来哥哥回来了,姐姐在我回长春走后才回家。灵柩用船运到福安公墓,下葬。过了春节之后,不久我就回长春。不知何时,嘉兴中学同学张励被介绍给我,她在吉林市教中学,她父亲张木舟,解放前是嘉兴县参议长,应该算是反动派,解放时逃往台湾,张励母女声明与其脱离关系。我到吉林市去看过她一次,没有动心。

大概就是1955年春,领导上调我脱产学俄文,共有六人:我,姚骏恩,钟奖生,刘颂豪,滕家帜,陈国勋。先就在铁北,后集中到胜利公园王大珩小楼,请了一个白俄,叫苏斯洛夫,这人在长江路还开了个小饭馆“红星饭店”。我认真下了工夫,还背字典,听力进步很快。1956年春节后不久,开始搞全国12年科学发展规划,需要俄文翻译,作为工作人员,我和姚骏恩被调到北京,住在西郊宾馆,一直工作到六月中旬结束。在结束前不久,接到长春通知,要派我去苏联学习,有点喜出望外。这时,张励的母亲正加紧到父亲处说项,姚骏恩劝我不要沾上这层社会关系,影响出国。1956年夏天,我和干福熹到北京,和当年科学院要派出国的人一起,集中突击学俄文,住在朝阳门内“九爷府”。教我们班的老师是苏联人,叫杨玛娅,她丈夫是中国人,姓杨。我的俄文基础好些,当了学习课代表。做练习中,我写,列宁比彼得大帝伟大,杨玛娅十分不满,她说不能将革命领袖和旧帝王相比,我很感意外,且不以为然。还有,一个南京天文台来的,姓朱,要我问她,如何与杨先生结婚的。我上他当,真的去问了,杨玛娅立刻脸红了,说不应该问这种问题。

十二、留学苏联

短短两个月的学习很快结束,九月上旬成行,经过长春时,仪器馆的同事到站台来送行,其中忘了是谁,要我交《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钱,而我肯定是已经交了,并且交得最早,但在那种场合,无法查核,只能再交一次,大概三元多。火车从满洲里出境,出境后是苏联餐车,第一次吃黑面包,就像第一次吃高粱米那样,肚子饿的,就是吃不下。经过7天7夜的颠簸,到达莫斯科,休息1~2天,我们部分人员到列宁格勒。在莫斯科时,和叶式辉去“北京饭店”吃饺子,一人要了十个,结果都只有九个,少了一个。

普尔科沃天文台在列宁格勒南郊的一块高地上,是进入列宁格勒的门户,二战时打得很厉害,都轰平了,见到的都是新种的小树,天文台的建筑都是刚修复的。我被安排在三楼仪器组的办公室里,有二个在读研究生,一个副博士,一个老的本科生,还有一个计算员,都是女的。很快见了导师马克苏托夫,他见面第一句话就问我吸不吸烟,知我不吸,就说非常好。而他自己烟瘾大得不得了,就是戒不掉。他在家里的墙上贴了一幅画,画着一个人的上半身,两个肺都烂了,下面写着:吸烟就是死亡。马克苏托夫给我定了研究题目,指定要看的书,安排好车间实习内容(磨一块直径160毫米,F/6的抛物面镜)。第一年,我们还要学哲学和俄文,都要到城里科学院院部去,每周2~3次。冬天列宁格勒日很短,早晨去,晚上回来,都是黑天。1957年,中苏关系紧张还只在最高层,苏方科学院对我们很好,普通人也非常热情,有一个人几次邀我到他城里的家里吃饭。第一个暑假还安排我们到海边“ЧЕРОДЕЙКА”疗养院休养,不过条件并不好,十几个人住一大间,洗澡要走很远。

刚到列宁格勒不久,国内有一代表团到列宁格勒大学参观访问,要我去做翻译,一位搞弹性力学的北大老师,刚好参观马克苏托夫女儿

的光弹性实验室。过几天,她到天文台来看她老爸,陪着散步,正好碰上,真巧。那位北大老师还嫌我俄文不好,换了个大学生(黄磷),结果比我还差,再来吃“还汤豆腐干”,还是找我去翻译,我好说话,没有拒绝。还有,彭真带领的人大代表团到列宁格勒访问,到天文台参观也是我做翻译。代表团里有龙云,程潜,龙的儿子龙绳德,要我帮他在城里买胶卷,结果约好时间,他却做了黄牛。龙云还想约列宁格勒的城防司令谈谈,想了解当年是怎样守住这座城的,我忘了,最后谈了没有。彭真在 ASTORIA 旅馆宴请,我参加了,就坐在他斜对面,他还问我学什么专业。

初到苏联的时候,大概有 1~2 年,感觉十分孤单,记得有一次苏方安排我们研究生乘船出涅瓦河,到波罗的海口,远望克朗施达特要塞等,我一面感到乘风破浪的快乐,心里却有强烈的“身为异客在异乡”的孤独感,心想,这才过去半年时间!所以,我很乐意国内来人访问,要我去翻译,一次是李明哲、龚祖同和邓锡铭,另一次是王大珩先生。陪他们访问了 ГОИ 和 ГОМЗ。那时,中苏关系在高层已经闹翻,这两个单位的军工方面不给参观,我方(李明哲)想介绍自己的军工项目来套他们话,他们当即电话请示莫斯科,回答不同意听,精得很。

1957 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普尔科沃天文台组织了人工观测,就是观测者用很大视场的低倍望远镜,守在预报区,等卫星飞过时默记住它和邻近恒星的相对位置,并用手中的跑表记下时刻,再立即将默记住的位置点在事先准备好的星图上,由专业人员作事后处理。这个方法现在看来非常原始,精度很低,靠多人观测结果平均来提高精度,但在当初是唯一的办法。我出于新鲜,参加了观测,并且很认真,天文台发了积极观测者证书,还有一枚纪念章。1958 年国内大跃进,搞国庆献礼,波及国外留学生,我和实习生杨世杰向老师提出要做一个 200 毫米口径的天文照相物镜,老师

听了十分吃惊地说,要做这样的光学镜头,这个小光学车间只好全交给你们了。不过,他还是替我们着想,建议做一个马克苏托夫系统,相对要简单很多。我们也真卖力,加班加点,我 3~5 天内搞好设计,二人在一个星期内就磨好了。国内搞民兵,开始要留学生也搞,请苏方军人讲过课,记得讲了有关核武器方面的知识,我把手上的夜光表凑近他带来的盖革计数器,确有反应。还真枪实弹打过靶,后来大使馆传话说,在人家国土上搞民兵,算什么?这才拉倒。

学习上我很卖力,主导思想是至少不要给国家丢脸,第一年内,研究生四门课程:哲学、俄语、二门专业都得了 5 分,这并不难。工厂实习也很努力,自己摆弄过磨玻璃,做起来得心应手。磨好的 $\Phi 160$ mm 抛物面镜,老师说 очень хорошо(好得很)。第二年起就进入课题,给我的题目是“大望远镜二次凸面镜的检验”,老师的期望是对 Hindle 方法做一个全面计算和分析研究。我在做的过程中发现,反射检验的补偿原理,也可以用在凸面镜的检验中,从而找到一个新的检验方法,比 Hindle 方法有优越性,我的论文重点也就移了位置。反射检验的补偿原理,是老师提出的,用在检验凹面主镜,苏联研究生 М. А. Соснина 正在做,作为她的论文内容。当我把我的想法和推导的公式向老师汇报后,他马上就接受了。苏联研究生在学习期间,要在研究所内作一次学习报告,我就将已经做好的部分和下一步要做的这个新想法作为报告内容讲了一通,结果被评为优秀报告,还得了奖励(一个月的研究生津贴,700 卢布)。老师有时主动到我们办公室来讲讲,一次他来,说起我这个想法,他指自己,说:“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我心里想,老师都想到了,那学生还做什么?我把这新的检验方法写成文章,投到国内《天文学报》发表了,想使国内先受益,那个苏联女研究生 Соснина 知道后,叫我马上写成俄文在普尔科沃天文台台刊上发表,所以国内发表

在先。还有一次,老师高高兴兴地来讲他新近推导出的一个公式,是用于最后收敛马克苏托夫式系统光学系统设计的,我抱着学习的心态自己也推导一遍,结果发现有一点小错,就去和他说了,正好,他在用这个公式时,发现总不能一次到位,很不自在。后来他用了我改正了的公式,就非常利索地一次解决问题。当然,他很高兴,表扬了我,还对其他研究生说:“你们只知道听,听过就算了,应该像潘那样……”弄得我很不好意思。还有,在读他的《天文光学》一书时,发现一处错,他一方面很高兴,一边在嘀咕,“那么多人看过,还是有错”。我用新的检验方法检验,并磨出了天文台上正在做的 PM700 望远镜的凸面镜,为我的论文加强了力度,也为台上解决了一个不小的问题。回国后,最初还通信,老师来信说:“城里的 TOM3 工厂用你的方法加工、检验了 6 米望远镜的凸面副镜”,这是后话。1960 年的元旦,老师请我到他家作客,就在天文台近旁,只他一人,他拿出珍藏的蟹肉罐头请我吃,临走还送我一套俄罗斯套娃。听说他和太太离婚是因为太太特喜欢养猫,还养一大群,他反对没用,只好离婚。1960 年 7 月二十九号,回国临别时,他和我在天文台门口的公共汽车站贴面告别,他的满脸胡子茬就像板刷。看来他对我这个学生是满意的,我也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确实学到了有用的知识,包括书本的和实际的。

十三、回到长春

1960 年 7 月下旬离开列宁格勒,在莫斯科稍作停留,自己参观了克里姆林宫,买了些小纪念品打算回国送人,8 月初,回到北京。国内大跃进的负面影响开始显露,物资开始短缺,科学院回国留学生集中学习,学些什么已记不清,无非是要大家正确认识形势,形势是大好,不是小好。张劲夫作报告,第一次听到“瓜菜代”的说法。当时留学生回国,可以结合个人志愿重新分配,长春光机所(原仪器馆,1959 年改名)已派人到科学院,一定要留住我。我当时有去天

文台的想法,但不是很坚决。有的人,像陈庆云就去了有机化学所。那时,光机所已从铁北搬到南湖边,宿舍很少,暂时住在大楼里,一大间住 5~6 个人,已实行粮票制,每月 28 斤,由于肉食少,28 斤明显不够吃,只能精打细算,体力支出不大时,就少吃点。后来有了高价点心,可以增加点油水。放在床边的点心盒里还有几块,是重要数据,不会忘的,有一次想吃时,发现盒子已空空如也。大楼里有不少包装箱木板,星期日,我借了工具,自己做了一个小刨子,钉了一个书架,还给王乃弘做了一张小桌子,那次早餐多吃了一两。

那时所长是王大珩,实权在书记兼副所长李明哲手里。1959 年,光机所已将 216 任务争到手,而后中苏关系紧张,国防任务吃香,李明哲开始抓 60 号和 150 号任务。我回所时,60 号已在做,但光学系统有问题,像质不好,我检验后知道是剩余球差和横向色差的原因,王之江说,光学设计横向色差是好的,可能透镜的等厚有问题。而那时装车间的顾码法认定是玻璃材料用错了,说是经复查证实过。我要求重新再查,顾有点不高兴,后来复查结果表明,玻璃没有用错,的确是等厚有差。从这件事开始,我在光机所渐渐建立起技术上的威信。往后,搞 216 的班子,有的调西安,有的去南京,李明哲顺便再卸掉个把包袱。我审时度势,看出光机所搞 150 任务的薄弱环节是在光学技术,即大口径光学的制造、检验和装调。所里有一台为“中间试验望远镜”磨主镜用的,刚造好还未用过的磨镜机,用来磨 150 主镜,要我决定是否可行。我看了空车试车,只听声音像开火车,振动也大,磨不好高精度镜面,认为要从新设计。向李明哲汇报后,他放下手头事,立刻和我一道去现场看过,并同意重做。通过这件事,我对他有了一个好印象。到 1963 年下半年,为 150 打基础的事情基本上已完成。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最重要的是能向上级显示的新东西,基础性的工作不受重视。1961 年,继美国之后光机所

也出了红宝石激光,王大珩所长还有点观望态度,而李明哲、邓锡铭、王之江等很敏感,认为是光学上的一次革命,应该大发展,于是直接捅到张劲夫那里,策划成立上海光机所。我的工作基本上是替人打工,在为光机所建立起大镜加工、检测等基础之外,还主动为夜视仪的光学镜头加非球面改正板,使其提高分辨率等。王乃弘搞砷化镓半导体,出不了激光,找我帮忙,我就陷了进去,当然,总是配角。很快,在1964年初就出了激光,国内第一,领先于半导体所。同时,也是王乃弘的点子,利用非受激发射的砷化镓二极管做光电话通话试验,到吉林市(吉林北山一桦皮厂)做试验,最远做到50公里,刘训阁还引来了市委书记。光电话热了一阵,不了了之。1964年成立上海分所,43室搞砷砷的一摊迁上海,我当然想去。很明显,李明哲不敢向王大珩提名我和王乃弘,只能以协助的名义出差去嘉定,呆了几个月。后来有一次王大珩到嘉定,在会上我谈到去留问题,还和他吵了起来。那时,个人根本无权决定自己的动向。1964年末回到长春,但工作方向无人过问。我开始还想重起炉灶,继续做砷化镓方面的工作,到器材领了一些东西,像真空泵,光电倍增管等,但没有真正启动。1965年中,科学院接了仿制“红眼”导弹任务,院内几个所搞协作,光机所做位标器。所里将41室的邓树森、田瑜等调到43室,成立541任务组,王乃弘当组长,我当副组长。和协作所的人有过一次共同到西安、洛阳等地调研的经历,回到北京后,张劲夫副院长还接见了大家,并讲话鼓励。当有人介绍我时,张劲夫副院长居然还知道我在苏联学习时搞了一个“潘氏法”的事,使我很感意外。“红眼”导弹没有实物,只看到几张发射时的照片和极少量资料。根据“响尾蛇”的图纸,我大致按比例缩小,画出了541位标器的结构总图,由裴庆魁拆成零件图。另外我还设计了测试用的光学系统。那时,试制工作进度很快,不到一年就出来样机,在实验室里能很远处跟踪一根香头。

1966年上半年做了很多次试验,最后装成整弹,到怀柔做打靶试验,记得那次郭永怀也去看了。那时已是“文革”伊始,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老一点的难逃“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帽子。王乃弘花大力气搞出锗参金元件,想解决迎面探测飞机问题,做成了位标器,到湖南莱阳去做试验。我那时已经有大字报,自然不会让出差去。莱阳试验之后,题目组陷入内部矛盾和争论之中,541工作已基本停止。记得有一次王乃弘较长时间出差上海,我独自利用541题目多下来的硫化铅元件,设计加工了一个简易装置,做了一次中红外成像试验,将加了热的电烙铁头在荧光屏上成了像,蔡仁堂等看了很感兴趣。这个试验的原理是王乃弘想出来的,在1964年左右对我说过,我本想541既然做不下去,我们就另找题目,避开41室合过来的人,少些矛盾。谁知王乃弘回来看后,并不积极,说了一句“蔡仁堂饥不择食”。不知他究竟是何意。科技处还给了题目为67号。后来“文革”局势越来越乱,除了150等紧急任务,别的题目基本上都停了。中红外成像要是那时当回事来做,说不准后来可以发展成光机所的一个重要方向。

“文革”中的恩恩怨怨现在只好不去说它。回想起来,最大的遗憾是耽误了最宝贵的一段时光,36~46岁。林彪倒台后,我得到彻底解放,到1972年,我已是军代表单奎章“改造”知识分子的典型,政治环境好了很多,可以做一些零碎的工作,在光学车间,我做了激光球面干涉仪原型试验,并接着设计了正式的激光球面干涉仪,后被光机学院作为校产品;还利旧利废,做了一台大型光学测厚仪,很解决实际问题;为输电供电部门设计制造了遥测高压线接头温度的红外测温系统的镜头;有一次,科技处组织人,有王大珩、唐九华、干东英等,在装车间查看新到货的进口T4经纬仪,发现目镜视场里看到度盘显示的一个局部模糊,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又不敢贸然拆开,把我找去。那时期什么都要首先从政治考虑,干东英就嚷嚷说,这是

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把发霉的货卖给我们。我仔细看了之后,发现模糊的地方和刻线有视差,不在同一平面,并判断,只要在目镜外加一片负透镜,就能看清模糊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很快找来负透镜,一看,原来是一点油滴,这下大家都无话可说。

但是“文革”大风暴过去之后,“工作上究竟做什么?”对我是个很懊恼的问题,我提出做红外,蒋厚震说“没有人”,但又说不出有什么可做。1975年,天文界要从东德蔡司厂进口一台一米望远镜,作为贸易补偿,缺少俄文翻译,我是最合适人选,经军管会同意,就去了。1977年又去一次东蔡司验收光学镜子,回来时经罗马尼亚,在大使馆接到国内通知,叫我在使馆等国内的一个代表团,一道去西德考察光学,是王大珩先生带队。我的英语听力还可以,在PTB参观时,介绍者想不起来“节点”的英语名词,难住了,我因完全听懂了他介绍的内容,所以知道他想说什么,及时提醒他“noddle point”,他还表示感谢。这主要是南模打下的基础,但是“说”就比较困难。1977年底,光机所紧急把我从南京叫回去,因为法国的光学权威马尔夏要去长春访问和讲课,要我当讲课口译,接到通知我心里有点虚,事先和王大珩先生说,如果有问题,中译英译起来有困难,要请他出马。这次,招待马尔夏在省宾馆吃饭,我也沾光,第一次吃到鱼翅。1975年左右,经王大珩推荐,我已和从新上马的216任务挂上钩,经常出差南京。我是想早日调到南京,只是碍于当时的人事体制,好不容易到了1980年才办成。光机所为了想留住我,还给我安了个光谱室主任的头衔,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我要走的主要原因:第一,没有适合的工作方向,感到非常空虚,这是主要的;第二,想回故土。“当官”之事,我是根本不在心上的。在长春,我默诵得最多的是范仲淹的词《渔家傲》“塞外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

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十四、入关

1980年5月,总算办好手续搬家南京,分在光学车间的技校学生帮了大忙。去南京我是有思想准备的,要准备“吃亏”,就是多做事、少考虑好处。开始总感觉进入不到216题目的角色,过了一段时间才慢慢抓住了要点,其实这个过程是总要有的,多用些心过程就短些。1983年把我推到副厂长的位置,人家说我“有权不会用”,一语说到要害,我丝毫不后悔,人各有志,应该发挥各人长处,对国家最有利。1986年天仪中心换届,要换我下来,南京分院找我去谈话,他们以为我会不大乐意,想送一个总工程师头衔来安抚一下。我说用不着,我把当官看作负担,我是看不起拼命想要当官的人的。一个是书记,一个是院长,这话可能会得罪他们。1986到1990这几年,大部分时间花在216上,特别是在车间装调和拍照试验,以及到兴隆山上的调试。1989年底,北台能按计划实现国际联测,我自知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但是在报奖排名时,由于找了很多学天文的人来投票,加之我准备得也不够,讲得不好,被他们排在第三,当然很生气,好在来南京时已有思想准备,“准备吃亏”,过些时候也就算了。

2.16米的工作占用不了我的全部时间,所以还做了不少其他事情:轮胎面加工、总参二部侦察车镜头、508所资源一号镜头、508所红外平行光管(第一次采用Yolo系统)等。单件制造离轴抛物面镜的技术,是由于昆明物理所的要求而开发的,经过无锡张青专公司的一段时间磨炼,想不到现在成了一个特色,已为国内做了几十块镜子了。在这同时,在设计理论上也有不少收获,如:Yolo系统的设计理论,三镜系统的求解方程等。在别人的鼓动下也曾想搞个公司,然而注册、财务、办执照等手续,问下来一头雾水,我不合适做这种事。1994年出版了《光学非球面的设计、加工与检验》一书,这倒是老伴催促出来的,很费了一番工夫。书出版后,

反应很好,800册,市面上很快就没了。请王之江写个评语,他看后说,“你后来还做了不少工作。”

对于申报院士一事,开始我总觉得很不容易,1995年以前,天仪中心按手续办了一次上报,没有通过,我根本无所谓。1997年,老薛鼓励我再报,第一轮通过了,第二轮因有人投诉,差一点,没过。1999年再报,算是通过了。其实我一直不太在乎此事,这不是风凉话。我总觉得王乃弘完全够院士条件,可是他到广州去办公司一着棋走错了,他也不是办公司的料。

2000年,苏州大学通过老薛,把我“挖”到苏大。我是以南京天仪中心退休人员的身份应聘的。无锡加工离轴抛物面的一个摊子也到了苏大,还有508所的关系也没有断,所以横向任

务总是没有断过。苏大给了一笔科研启动费,使我实现了一个愿望,就是老早在“文革”时期无事可做时捉摸出来的,制造非球面的新原理。苏州有我一位老同学吴锦明,退休在家,当过长风机械厂厂长,自己懂机电业务,又熟悉各类人才,组织了几个人,一年左右就把机器做了出来,免不了有些缺点,但作为自用,关系不大。

2003—2004年我把书作了一些增删,由苏大出版社再版发行,也算完成一件心事。也是在2003—2004年,我发现了一个新的望远镜系统,称之为“泛卡塞格林系统”,有很大优越性,小口径的可作为科普望远镜,大口径的可作为专业用,但真正被人们认识,看来还要有一个过程。余下的几年时间和精力就想做好这件事。

写到这里,作为自述,可以告一段落。